



热烈庆祝 浙江省十二届人大五次次会议 隆重召开
浙江省政协十一届五次次会议

开创绿色发展新境界
打造美丽中国样板区

—仙居县图书馆—

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联盟

目 录

“打造美丽中国样板区”概述	1
“美丽中国”的理论指导.....	1
美丽中国不能缺少绿.....	6
“中国梦”视野下的美丽中国建设.....	9
“美丽中国”视野下中国绿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20
打造美丽中国样板区城市案例	22
重庆“美丽山水城市建设”的实现路径.....	22
美丽中国建设样本——美丽杭州.....	31
转变发展方式——建设美丽中国的厦门样板.....	37
寿光——打造美丽中国的样板区.....	49
打造美丽中国样板区在仙居的探索和实践	52
绿色，引领经济转型——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的“仙居路径”.....	52
中国山水画城市——美丽仙居的绿色化发展改革之路.....	57
“2016 美丽中国行”聚焦神山秀水的仙居.....	62
仙居绿色乡村建设标准化试点跻身国家级 浙江仅仙居入选.....	65
相关学术研究	66
绿色发展理念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思考.....	66
绿色治理：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	73
走绿色发展之路，建设美丽中国.....	81
从“美丽乡村”到“美丽中国”——解析“美丽乡村”的生态意蕴.....	85

免责声明:

浙江“两会”专题信息产品由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联盟各成员单位联合编辑。信息内容采自公开的报纸、图书、期刊、数据库资源以及各大主流网站，每份专题我们都准确标明来源和出处，摘选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由发布单位负责。

本期专题由仙居县图书馆编辑，如您需要更为详细的内容及跟踪报道，请与该馆联络。

“打造美丽中国样板区” 概述

“美丽中国” 的理论指导

“美丽中国”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在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时对于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美丽中国”包括了自然之美、发展之美和百姓之美，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关系。

“美丽中国”的提出是对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问题的反思，并且树立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远大目标，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美丽中国” 的提出

两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都在持续的向前推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同样面对着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的难题。我国主要的生态问题：首先，水资源的匮乏和污染。包括海洋、湖泊和河流在内的很多水源被工业生产排放的有害物质污染，淡水资源浪费情况十分严重。第二，空气污染严重，工业粉尘、烟尘等有害物质排放量超标，各地出现的雾霾天气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第三，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严重。据 2014 年的最近统计数据，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近四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540 亿元。最后，工厂排出的污染物和人们的生活垃圾不断增多且难以处理。以上这一系列的污染使得原本就匮乏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等更为稀缺。除此之外，包括垃圾处理、自然灾害等在内的所有的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人们的生存，阻碍我国向前迈进的脚步。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于生态环境、公平正义、文化娱乐、健康水平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呈现出不同于只求温饱的多元化现象。现在的人们向往更高层次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在同一时间内开始逐渐暴露。人们对于环境问题和生态破坏的关注度逐年上升，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却出现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除此之外，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还体现在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维

护公民利益的社会保障的追求。

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问题，以及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美丽中国”应运而生。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美丽中国”。这是“美丽中国”首次作为执政理念提出，也是中国建设五位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依据。“美丽中国”是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严峻局势下，深刻理解生态文明之后应运而生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中国发展上的具体体现；“美丽中国”是充分将生态文明建设的“优节保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发展目标的回答；“美丽中国”是对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再次补充，充分体现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美丽中国”突出生态文明、兼顾四个方面，使科学发展更为协调、理性和健康；“美丽中国”是中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战略支撑，为绿色经济、绿色新政等的实施指明了方向，树立了目标。“美丽中国”的提出，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尊重自然、保护环境，最终的目标是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幸福，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美丽中国”的含义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美丽中国”用通俗易懂的简单词语概括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在未来发展和建设的目标和实现途径。“美丽中国”是自然之美、发展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文明理念，也是实现环境良好、资源丰富、经济繁荣、政治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理论依据。建设“美丽中国”主要包括了两个重点：首先，突出生态文明的建设。第二，是将生态文明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相融合，形成“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方式，在发展和建设的各个方面都要做到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正确处理人、自然、社会三者间的关系。

1、“美丽中国”的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体现了人与自然协调共处的和谐关系。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与自然始终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自然长期并稳定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和客观条件。同时人类也在以自身的实践改变着自然，决定着自然面貌的状况。如果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合理的、有节制的，那么自然也会因为人类的改造而变得更美；反之，如果人类毫无止尽的向自然进行索取、过度的开发利用的话，自然就会因为人类的改造而变得丑陋和不堪一击。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美丽中国”的自然之美，是适合人民居住的环境之美：不仅是当代人能够看到的蓝天白云，而且还应该是后代人也能享受到的青山净水。通过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从根源上扭转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美丽中国”的自然之美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和环保节能相结合，追求以保持和创造美好的自然环境为前提的理性长远的发展，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为人类造福。

2、“美丽中国”的发展之美

美丽中国的内涵包含了一种符合当前发展需求的新型发展方式，体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我国发展方式的反思。1949 年以来，中国的发展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间，这个时期将经济发展简单的定义为数字的增长，属于粗放型的发展模式。第二，改革开放以后的 20 年间，这个时期的发展方式重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共同发展。但是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地区间的差距加大；资源的浪费和污染依然严重；人们日益多样化的精神、物质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第三，上世纪末至今的发展方式。这个时期提出了统筹多重利益、重视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所引导的发展方式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创新。“美丽中国”的提出为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了远大的目标，将中国发展梳理成一个互相影响的整体，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使之融入到各个领域的发展之中。

“美丽中国”的发展之美，包括了经济发展的健康协调、政治发展

的民主法治、文化发展的传承发扬，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各项建设当中，是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发展状态。所以，“美丽中国”追求的发展之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和最终归宿。

3、“美丽中国”的百姓之美

“美丽中国”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相容、经济和自然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由此可见，“美丽中国”的最终归宿就是以人为本，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百姓之美主要体现在社会建设的民生方面：社保、教育、就业、分配、稳定。首先，社保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和依靠，社保制度的完善使人民生活更有安全感，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衣食无忧；第二是教育，教育是人们获得更好生活的保障，也是国家强盛的根本。通过教育，能够培养出为社会创造科学知识和物质财富的人才，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第三是就业，就业是人民得以生存的基本，就业尽可能满足更多自食其力的人通过就业保证生存和生活需求；第四是分配，分配能够保证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果实。合理的分配有利于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逐渐缩小贫富差距，也更能体现社会的公平。最后就是稳定，稳定是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只有社会稳定，人们才会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美丽中国”将百姓之美理解成优良的生活环境、公平稳定的社会、自身的全面发展等，具有深远的含义。

“美丽中国”提出的意义

面对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在先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执政方针后，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美丽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文学化的诗意表述，其中蕴含了我们党关于国家发展的理性认识和科学智慧。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名词，也描绘了中国未来发展、人们幸福生活的美好蓝图。

“美丽中国”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蓝图

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者怎样做到和谐共存。生态文明建设则是这一重要转型时期的工作重点，也为今后中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生态文明建设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出发，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作为发展中的重点，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从而保障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同时，生态文明建设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保障。“美丽中国”的提出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也从理论上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远大目标，也为中国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美丽中国”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实践路径

“美丽中国”不仅包含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远大目标，还包含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美丽中国的提出，构建出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制定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宏观目标，并且整合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系统。在政治方面，遵循节能环保的基本国策；在经济方面，同时重视经济的增长和质量，降低能耗和污染；在文化方面，提高居民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支出比重，将环保节能和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的知识作为重点普及内容；在社会方面，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作为工作重心，使更多的人、更公平的享受到发展的成果。美丽中国将百姓之美作为发展的归宿，突出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随着“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体系的不断完善，全国各个地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也有更具体的标准。总之，“美丽中国”的提出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实践路径。

“美丽中国”和绿色发展的关系

“美丽中国”和绿色发展具有辩证关系，两者均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紧密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远大目标的手段，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引擎。“美丽中国”描述了绿色发展的最终目标，绿色发展则是实现“美丽中国”美好愿景的

途径。

“美丽中国”是绿色发展的目标

“美丽中国”用简单易懂的方式概括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目标，包含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是自然之美、发展之美、百姓之美的有机统一。十八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所以，“美丽中国”则是绿色发展的目标。通过绿色发展，经济得以持续而健康的增长，绿色经济的发展带动绿色文化、绿色政治、绿色社会的发展，最终改善人类生存的环境，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绿色发展是充分考虑环境资源问题的新型发展方式，并将美丽的环境、持续稳定的发展、安定公平的社会、幸福生活的人们作为绿色发展的最终目标，这就是“美丽中国”的丰富内涵。由此可见，绿色发展是实现“美丽中国”的途径。

绿色发展追求的是和谐、效率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展方式，是将发展和自然相结合的理性的发展方式。以往的发展方式并没有考虑到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过分重视经济在数量上的增长，所以造成了如今严峻的生态问题。“美丽中国”是对以往发展方式的反思，同时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在绿色发展的过程当中，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加快治理污染区域并重视环境的修复和保护，实现“美丽中国”的自然之美；同时绿色发展能够降低单位 GDP 能源消耗量，逐渐缓解环境资源问题，使经济发展更为理性持久，达到“美丽中国”的发展之美；完善绿色发展保障制度，使全民都能够享受绿色成果，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美丽中国”的百姓之美。由此可见，绿色发展是实现“美丽中国”的途径。

（来源：《美丽中国视野下的绿色发展研究》2015 年 6 月 吴茵茵）

美丽中国不能缺少绿

美丽中国，绿色是本。如果占国土面积 69%的山区到处是童山濯濯，占国土面积近 4%的湿地浊水横流，占国土面积 27%的荒漠化土地经常风沙肆虐，那么“美丽中国”就是一句空话。林业部门肩

负着森林、湿地、荒漠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管理职责，为祖国大地更多地披上绿装责无旁贷。

建设美丽中国，林业承担着重要使命

“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一直是我国林业和务林人的不懈追求和光荣使命。美丽中国，美在山川秀美原野锦绣。大地只有披上绿装，美才有基础；只有绿化才能美化，只有山清才能水秀。林业是自然资源、生态景观的集大成者，是山川原野的天然化妆师。发展林业是实现山川秀美的重要保证。享誉海内外的四川九寨沟、湖南张家界、湖北神农架等，都是因森林、湿地而美，因森林、湿地而秀。美丽中国，美在人与自然和谐。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建立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上，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3000年前，我国黄河中上游地区森林覆盖率超过50%，创造了繁荣昌盛的中华古文明。但由于对黄河流域的过度开发，流域内的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草场退化、风蚀沙化，黄河文明逐渐衰退了。保护好森林、湿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美丽中国，美在生态文化繁荣。森林是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依托林业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生态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又吸收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内涵十分丰富，深受群众喜爱。建设美丽中国，应充分挖掘和提升林业的文化功能和精神价值，实现生态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美丽中国，美在绿色经济发达。建设美丽中国，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必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森林既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也是可再生资源的产地，还是陆地上最经济的“吸碳器”和“储碳库”。以培育和利用森林资源为主的林业，集生态产业、生物产业、循环产业于一身。近年来，许多地方打山水牌、念生态经、唱景观戏，推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内在统一。

建设美丽中国，缺林少绿是一大短板

研究表明，要实现山川秀美，森林覆盖率应该在30%以上，并且分布相对均匀。近10年，我国年均完成新造林超过8000万亩，森

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8.6%提高到目前的 20.36%。但我国森林资源总量仍然严重不足，森林的分布不均衡，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生态功能不强，从总体上看，依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一大短板。湿地面积仍在萎缩。近 10 年，我国湿地面积减少了 2.9%，目前自然湿地面积仅占国土总面积的 3.77%，远低于世界 16%的平均水平。被誉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若尔盖等湿地萎缩严重。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83%的三江平原湿地已不复存在，洞庭湖水面缩小了 40%。一些内陆湿地由于污染严重，功能逐渐退化。土地沙化十分严重。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 260 多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 27%。约有 330 万平方公里土地和 4 亿人口受到荒漠化和沙化的影响，每年因沙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在 500 亿元以上。甘肃省民勤县过去 10 年共有 2 万多农牧民因沙害被迫迁移。水土流失面积巨大。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356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37%，年均土壤侵蚀量达 50 亿吨左右。严重的水土流失，直接威胁着国家生态安全、粮食安全、防洪安全，甚至直接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安全，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物种保护形势严峻。目前，全国高等植物和脊椎动物种类中，濒危和受威胁的物种已占到 10%—15%。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局部地区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环境不断恶化，大量物种的遗传资源不断丧失，捕杀和食用野生动物现象时有发生，物种保护形势十分严峻。

建设美丽中国，林业部门要重点做好四件事

建设美丽中国，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让人们享受优美的生活环境和更好的生态产品。林业部门要以改善生态和改善民生为主攻方向，重点做好四件事。

第一件事，把祖国大地打扮得更绿更美。一是促进生态空间山清水秀。通过义务植树、重点工程造林等举措，让广袤国土披上美丽绿装。二是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深入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湿地保护恢复、石漠化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扩大森林、湿地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三是提升自然生态的美观程度。以生态文明和艺术美感

的理念为指导，不断提升森林、湿地、荒漠等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和景观效果，充分展现其自然之美。

第二件事，满足社会对绿色资源的需求。一是守住 46 亿亩林地资源。坚决遏制林地过快过多流失，积极开展废弃矿山和其他闲置土地的植树造林。二是建设好绿色原料林基地和林产品基地。加快发展林下经济，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绿色产品和森林食品，满足经济发展和老百姓健康生活的需要。三是发展好木本粮油和生物质能源。加快发展油茶、核桃、红枣、板栗等木本粮油，为国家粮油安全提供支持。建设黄连木、文冠果等一批生物质柴油原料林示范基地，推进清洁能源发展。

第三件事，让生态文化融入人们生产生活。一是宣传和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形成崇尚自然、保护生态、节约资源的社会风尚。二是传承和发展生态文化。大力普及森林文化、湿地文化、生态旅游文化，积极弘扬关爱宠物和保护野生动物的文化。三是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加快发展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加快建设一批生态文化博物馆、展览馆等，让人们得到生态文明理念的熏陶。

第四件事，用制度为建设美丽中国保驾护航。一是加强林业法制建设。修订完善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防沙治沙法等法律，研究制定一批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断完善林业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加强林业发展考评制度建设。将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纳入到各级政府的任期目标考核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考核之中，严格执行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考核制度。三是加强林业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林业公共财政支持政策、基础设施投入政策、金融和税收扶持政策、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完善征占用林地定额管理及审核审批、林地林木权属登记等办法。

（来源：《求是》2013 年第 47 期 赵树丛）

“中国梦”视野下的美丽中国建设

在科学理论的宣传和普及方面，恩格斯有一个论断，那就是“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这是冗长的

论述绝对做不到的”。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理想——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用“中国梦”这一中国人民喜闻乐见、世界人民也易于产生共鸣的字眼加以概括，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魅力。

中国梦包含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容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衰败下去，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站起来”固然不容易，但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今天的“中国梦”离开了美丽中国建设，就将是不完美的，“美丽中国”是当代中国人“逐梦”的不可或缺内容。

首先，从“中国梦”所包含的具体奋斗目标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梦”作为“民族的梦”是恢宏的，然而在现实中，它却是由每个人的梦想、每项工作的努力汇聚而成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梦”必须回应的“时代的声音”。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更优美的环境”如同丰衣足食、人身自由、知书达理、公平公道、安居乐业、和平和谐等一样，不需要什么高深莫测的说教，当山川秀美、山清水秀离人们渐行渐远，甚至连呼吸安全都成为一种奢求的时候，每一个正常的人都不难理解正确处理人地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不难理解无人能置身于美丽中国建设之外的道理。这是一个常识、常情、常理，是一个不可违背的社情民意。

其次，从实现“中国梦”的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看。“道路决定命运”，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建国之后只有走有中国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才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样，今天我们只有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能实现“中国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强调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就包含着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崭新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总布局”的认识，经历了从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再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最后形成“五位一体”的总布局。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走向美丽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梦”的内涵，表明“中国梦”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实践风格。

再次，从“中国梦”提出的国际背景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创造和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饱尝了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恶化、气候异常、灾害频繁的苦果。为了拯救地球这一全人类共同的家园，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国家、民族和政党，无不高度重视生态文明问题，举凡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关于“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警告，全球达成“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现代化”的共识，绿党和其他生态组织主导的社会运动在不少国家方兴未艾等等，都验证了这一点。我们党庄重承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由此看来，中国人民对“美丽中国”和“美丽地球”的期盼，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对“美丽祖国”和“美丽地球”的期盼是相通的，这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当然，美丽中国建设也为实现“中国梦”创造着良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自在自然不断地转变为人化自然，自然界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不断被改造成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现，自然人化的过程与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具有共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丽中国建设所带来的天蓝、地绿、水净的自然环境，必将转化为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从而为中华民族实现永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中国梦”视野下的美丽中国建设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及西方发展模式的超越

首先，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的超越，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曾深受东正教“弥赛亚使命”的影响——这一教义把俄罗

斯民族说成体现神的意志、负有拯救和解放全人类之使命的唯一“慎选民族”，所以，苏联一直有同美国争霸世界、争当超级大国的梦想。但是，苏联模式不但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存在着过度集权的弊病，而且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乏善可陈，这也是苏联模式缺乏潜力，无法长期维系的重要原因。

苏联建政时，自然资源的禀赋是非常优越的，但在行政主导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苏联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基础上的，相同国民收入所消耗的资源大大高于西方国家，此其一；其二，开发管理不当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国有企业垄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设备和工艺落后，管理粗放，不关心资源节约，不仅浪费、盗窃现象非常普遍，而且事故频繁发生；其三，盲目征服自然的做法恶化了生态环境，如围垦湿地、排沼填地、开垦荒地、沙漠调水等导致了气候干燥、土壤干化盐碱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沙尘暴、河湖水位下降等生态灾难，连官方都承认相当一部分面积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甚至是生态毁灭；其四，出于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赶超目的，苏联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其中危害最大的要数放射性废物污染了，无论是源自核武器生产、核试验、核能利用过程中出现的核事故和核废料，还是潜艇上的核反应堆、废弃的核工厂等，都留下了许多放射性废料，致使苏联由于辐射而导致的血液病和肿瘤病人不断增加，并且其恶果一直延续至今。虽然苏联很早就意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完善的立法、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环保机构和为数众多的环保组织、有出色的环境科学家，但体制性弊端决定了苏联模式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是苍白无力的。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奉行和固守苏联模式，有学者甚至认为，对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苏联模式“最适合的是中国”，因而苏联模式下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只是轻重和形式有所不同，典型的像 1958—1960 年的“大跃进”运动，在“赶超英美”口号的激励下，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干了大量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尤其是出于土法炼铁的需要，滥开滥采煤炭和矿石，滥砍滥伐林木，“河南省

大别山区的有些县，树木被砍伐殆尽，四川省境内长江上游的林区被毁林木达几十万亩，加剧了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带来了长期隐患”。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表示，我们国家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不适应现代化“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这当中，就包括资源环境方面的反思与革新。我们党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九五”计划决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五”计划首次提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的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十一五”规划首次将能源消耗强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作为约束性指标并就“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进行部署，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进而将其列入“总布局”之中，在国际共运史上，我们党较好地理论上解决了苏联模式下长期未能解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问题并付诸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其次，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超越。二战前，西方国家的“列强梦”表现在以武力征服殖民地半殖民地，战后则表现在借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主宰世界，包括推行生态霸权。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和政要极力鼓吹“可以使重建环境和赚钱成为一回事”的“绿色资本主义”，但是：1. 西方国家的体面生活和生态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支配世界来换取的，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 2010》，高收入国家的生态足迹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三倍，是低收入国家的五倍，美国是生态足迹最多的国家，如果地球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能源、排泄废物，那么就需要 5.3 个地球，西方国家还在“绿色消费”的旗号下过度提高保健标准，实际上是鼓动浪费，其中以食品为甚。试问这种模式能够支撑多少人和多长时间？2. 西方国家在对待国内环境和全球环境问题上所持的“双重标准”，越来越暴露出他们的虚伪性，典型的如 2010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曾发出这样的警告：“如果 10 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

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

3. 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其中多数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同样受到发达国家的生态侵略，如后者将越来越多的垃圾运往海外倾倒即是显例。英国学者理查德·史密斯说：“我断定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主义永恒不变的‘铁的法则’，它凌驾于所有法则之上，也划定了生态改革的界限——这与绿色资本主义理论家的设想大相径庭”。

中国无法重复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一是这与社会主义立志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背道而驰，与中国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并且损人利己的做法也为深受传统“和谐”文化浸润的中国人民所反对；二是西方国家基于自身私利而绝不苟同中国采取类似的做法；三是无法从对中国寄予厚望的世界人民那里获得任何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梦”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因而在美丽中国建设的问题上，重走苏联模式的老路肯定不可取，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并企图效仿之的邪路也肯定行不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回答只能是：坚定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中国梦”视野下的美丽中国建设既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也重视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的严峻形势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约束趋紧，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赖度快速上升，特别是石油的对外依赖度达到近 60%，多年平均缺水量 536 亿，耕地逼近 18 亿亩红线；二是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空气 70% 不达标，在最大的 500 个城市中只有不到 1% 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雾霾天气增多，PM2.5 引发的多种疾病造成不少人过早死。20% 左右的国控断面水质依然为劣 V 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城市地下水过量抽取且受到严重污染，基本清洁的只占 3%，化肥、农药和地膜的污染、食品添加剂和抗生素的滥用等，也给人们的“舌尖”带来了极大的隐患，“癌症村”在整个中东部地区，从南到北，密密麻麻，令人不寒而栗。三是生态系统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和沙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37%、18%，90% 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地面沉陷面积扩大，生态

系统破坏带来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涝、滑坡、泥石流、酸雨等频发。近年来，环境群体事件不断上升，政府公信力饱受质疑，成为影响国家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忧心忡忡地发出了“环境污染让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感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必须首先高度重视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保护。传统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力”定义为“人们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能力”，现在看来，这样的定义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并未表现出对生态安全的关注，因而应当增加一个前提，这就是人类首先要有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能力。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一方面早就有过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曾数次引用 1865 年巴黎出版的比·莫斯特的著作《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中的一句话：“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党的十八大提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表明我们党正本清源、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和决心，这就像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所说的那样：“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重视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保护固然没有错，但必须将这项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美丽中国建设是“中国梦”的组成部分而非全部，如果将其提到不适当的地位，那就必然会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像国际上一些秉持极端环保主义、极端原生态主义的人士，一味地反增长、反技术、反生产，提出令人难以承受的生态、环境的评价标准和行动要求，崇尚“回到丛林去”的浪漫主义自然观，有时甚至不计后果地付诸行动，如为救被用于医学实验的动物而殴打医生和损毁实验室、只要动大自然一草一木就以死相搏、不分青红皂白反对资源开发利用等，就充满主观臆测和情感驱策，甚至演变成“环保恐怖主义”。国际上一些深绿组织为广

大发展中国家设计的生态议题和项目，往往是超越阶段的、无法实现的，其动员方式和行动策略只会给这些国家的发展、稳定带来冲击和破坏，这类行径显然违背了生态文明建设只能与文化多样性并存而没有单一模式的规律，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清醒的头脑。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我们所做的各项工作，包括生态文明建设，都必须体现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服从和服务于提高人的素质、造就具有“真，善，美”品格的一代新人，否则就会因失去人这一普罗泰戈拉所说的“万物的尺度”而黯淡无光，或因背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丧失合法性。因此，我国在抓紧抓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同时，还应重视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造福人民，这本身也是美丽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例如，保护野生动物是为了维护生态平衡，但如果把保护标准用于满足人们日常消费需要的畜养动物，那就走入了误区，非理性的“善待动物”或“动物权利”，不仅破坏资源环境、造成疾病蔓延，而且对绝大多数非素食主义者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再如，水能资源属于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它在发电方面具有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核能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并且实践证明现代调蓄水库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保护作用。我国的水能资源居世界第一而目前的开发利用尚不足 10%，但一些极端环保组织却宣称水电开发不可避免地要破坏生态环境，尽管他们找不到一个真正能够说服人的有力证据。对此，我们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揭发“伪环保”把生态保守当成生态保护的欺骗，进一步做好水能资源发电这篇文章，全面促进资源节约。总之，在美丽中国建设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按科学规律办事，消除各种错误言行的偏见和干扰，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并举。

“中国梦”视野下的美丽中国建设重在行动

“中国梦”寄托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雄心壮志，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中国梦”所蕴涵的美丽中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本质要求，“中国梦”是可亲可敬可爱的，美丽中国是值得憧憬和向往的，美丽中国不靠什么神秘的力量或奇迹，而是取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和成效。“文明是实践的事情，

是社会的素质”，如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一样，生态文明也重在建设，美丽中国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接力奋斗的事业和过程。

首先，要“唤起民众”。“唤起民众”是孙中山临终前的嘱咐，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美丽中国建设同样离不开“唤起民众”，因为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观念是关键……最严重的污染是心灵的污染。环境的改善归根到底取决于价值观的改变”。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包括政治建设在内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率先树立并始终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改变目前有悖生态文明的产业政策和法规规章由政府部门或国有大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定调定版并强制社会接受的做法，打破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对环境污染事故以罚代管、代法、代诉、代刑等怪象，这样才能发挥好“上层建筑”对社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并且重塑政府公信力。另外，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公民既是直接受惠者，也是直接参与者，因而公民更应把美丽中国的愿景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社调结果显示，“可持续发展”是老百姓高度认同的改革价值取向之一，但目前的情况是口头赞成而一遇到实际问题或一触及自身利益就南辕北辙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就向公民提出了一个进一步养成生态道德行为的严肃问题。公民不但要积极争取生态文明建设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更重要的是要从自身的敬畏自然、保护环境、科学消费等点滴事情做起，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成为内化价值和自觉行动。总之，美丽中国建设要唤起包括干部和群众在内的全社会成员来共建共享，在社会各阶层中形成牢固的生态文明统一战线，从而增进动力、减少阻力，不断取得实效。

其次，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重在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循环发展重在探寻如何将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第三个环节转化为“再生资源”，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低碳发展重在追求节能降耗，以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三者也是当前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重点任务和重要内涵。具体而言：1. 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方面，必须重视其中所蕴涵的“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生态文明要义，引导企业依靠科学技术和科技进步，把节能环保当作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提升社会形象的要事抓紧抓好。当前要逐步改变消耗高、污染多的行业和企业所占比重过高的情形，杜绝一些企业以污染物直接“上天、入地、下海”为代价攫取利润的行为，防范其将资源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外部化或推由代际来偿还。近年来，山西省知名的信息高新技术企业——罗克佳华公司将物联网技术引入环保领域，自觉接受环保部门对企业的监控，实现了环保、治污与企业效益的双赢，并且这一“环保物联网”还逐步被推到全省和全国，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是完全可以在美丽中国建设中有所作为的。2. 在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方面，基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所显示的农业已成为我国污染大户的严峻事实，粗放型农业的转型亦势在必行，其中一个努力的方向，就是要针对以往农产品因产地及其生态环境模糊不清并且要经过数个流通环节转手而导致消费者无法对其进行“追根溯源”的情形，明晰农产品的“身份”，推进产销直接对接，还消费者一个明白，给生产者一个强大的约束。这也是打响农产品安全质量品牌、恢复“绿色农业”本来面目的必由之路。3. 在大力扶持服务业发展方面，必须看到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不仅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而且较之第二产业，服务业还具有能耗低、产出高、就业率高以及科技含量高、效益高、拉动整个经济发展的贡献大等优势，因而要从根本上破解我国经济发展中能源、环境、资源、民生等方面的矛盾，就必须使服务业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此举可谓事半功倍且易于赢得全局主动。总之，只有将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理念渗透于产业体系之中，增加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渴望的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和洁净日用品、食品、药品等，美丽中国才有望奠基在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成为一个生态安全的国度。

再次，要加强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国学者一亨廷顿认为它是一种“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发生的行为模式”，邓小平也强调它较之人的因素“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

定性和长期性”。生态文明制度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硬件”（生态文明理念可视为“软件”），有着类似的价值。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着眼点主要有：

1. 考核制度。关键是改变“GDP 挂帅”的政绩观，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的考核制度就是要使“指挥棒”回归正确指向，因而它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
2.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国土空间中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这两类主体功能区，前者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后者则是依法设立各类自然保护区，它们由于更多地承担生态功能而面临弱化乃至丧失经济发展机遇的困境，因而必须通过深化公共财政体系改革，实施财政转移制度，逐步使当地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并借助生态修复和发展生态经济走致富道路。同时，还要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和环境保护制度。
3. 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关于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当前应尽快取消自然资源一级市场供给的双轨制（即行政无偿出让和有偿出让并存），使企业通过招标、拍卖等市场竞争手段公平地取得资源开采权，以此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损害成本，解决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短板”。关于生态补偿制度，关键要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实现生态环境的“善治”之长效机制。此外，目前正在试点进行的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等，也是试图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对此要大胆地试，总结经验，及时推广。
4. 制裁制度。包括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资源环境是重要的公共产品，涉及公共福祉，其受损之因人祸远大于天灾，因而不但要重视对人身损害和直接财产损害、精神损害的“个人”进行赔偿，而且要重视对环境公益损害、间接财产损害和环境健康损害的“人类”、“后代人”进行赔偿，此举有利于更好地扬善惩恶，使人们不敢轻易卷入生态违法活动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必须及时将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形成依法办事的习惯，“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

些”。

最后，要重视借鉴国际社会的有益成果并加强国际合作。相对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生态环境问题的简单性（主要是工业污染）和集中性（主要在规模性生产单位），当今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复合性（类别多且密切交联）和分散性（主要在非规模性生产单位和个体），因而治理难度很大，但也要看到中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教训的“后发优势”。撇开社会基本制度的因素，西方国家在生态环境的立法、行政监管、技术发明和应用、公民参与和教育、国际合作等方面，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做法，尤其是通过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推行“环境经济政策工具”，较好地实现了外部性污染的内部化和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的目的，体现了“绿色增长”的要求。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像地处南美洲的玻利维亚不但恢复了高原印第安人旧式的对地球母亲的顶礼膜拜，而且举国上下一致同意确立赋予自然“人权”的《地球母亲法》，此举虽然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但还是值得关注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人类生态文明成果的扬弃，因而美丽中国建设理应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汲取他人精华，刚愎自用开放世界其实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同时，在联合国框架内由 30 多个机构共同行动的“环境全球管治”，在全球性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我国应以更加积极有为的态度参与到全球环境事务的管理之中，加强中国环保组织与国际环保组织的联系，坚持公平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生态环境问题，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为呵护地球、保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东南学术》2013 年第 5 期 林怀艺）

“美丽中国”视野下中国绿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自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以来，中国绿色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十一五”规划设计了多个人口资源环境指标来评估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的协调情况，并约束经济生产活动中资源总

使用量和单位使用量。这些约束指标有效约束了地方政府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活动，将节能减排的要求落到实处，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的平衡。截至 201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降低约 19.1%，达到预期目标；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用水量降低 35%，实际情况高于预期估计的 30%，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达到 69%，高出规划目标 9 个百分点；农业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系数达到预期的 0.5%；森林覆盖率达到 20.36%，超出预期约 0.36 个百分点。在节能减排方面，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下降 14%，化学需氧量下降 12%，均超额完成预计的 10% 的目标。除此之外，在大气污染的治理、水资源污染的治理、生活垃圾的处理方面初见成效；对于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的维护方面也有较为瞩目的成果。绿色发展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和亮点。“十二五”规划阐述了绿色发展的目标，其中特别强调节能减排的目标；详细制定了绿色发展的各项指标，以评估绿色发展的情况，找出问题所在；制定一系列的问责和激励的机制，保证绿色发展的推行。通过政府、企业和大众的参与下，绿色发展的脚步正逐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绿色技术作为绿色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在绿色发展模式下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自绿色发展提出以来，我国申报新技术、新能源的专利数量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 and 专业人士投身于绿色技术、绿色能源的发明和研究当中。预计在今后 5 到 10 年中，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智能网络工业将得到显著发展。环保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维持在 15% 到 20%，2010 年我国环保产业的年产值已达到 10000 亿。同时，政府也在加大对于绿色发展的投入。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表明，截止 2012 年，全社会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总数在 10 年内翻了五倍之多，达到 8200 余亿元，GDP 的占有比重也增加了 0.4% 左右，达到 1.59%。2013 年中央政府对于环保投资的支出达到 3300 亿元，年均增长超过了 14%。环保部称，中国环保投入将以每年增长 2000 亿元的速度增加。到 2012 年，从事环保产业的单位超过 20 万个，有超过 319 万的工作人员从事与环保相关的工作。

在文化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绿色发展的宣传活动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多的将注意力转移到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之上。人

们通过各种渠道逐渐了解相关知识，同时，人们开始呼吁和重视“绿色”概念。绿色食品、绿色建筑、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等关于“绿色”的观念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根据相关的调查结果，有九成的网民都有绿色消费的意识，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消费绿色产品。可见，倡导节约的绿色消费观正在慢慢深入人心，绿色生态意识也在逐渐普及当中。除此之外，近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了《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等法律和政策，对于环境资源污染行为也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和惩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制定并施行 10 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20 部关于资源保护的法律，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近 200 件，各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环境法规和规章共 1600 余项。涉及面广的多种法律规章为推行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持，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绿色发展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性工程，每一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均会对其他方面甚至整个系统的推进产生积极的作用。例如，目前我国每年对于绿色发展的投入都在不断提高，这不仅加大了包括绿色技术研发在内的绿色产业的扩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有效提高了政府、企业和一般民众对于绿色发展的关注度和认识程度。绿色发展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也会加快环保节能等工作的进程、加快绿色发展相关制度的建立。与此同时，保障绿色发展的法律制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绿色发展的质量，并且保证了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顺利进行，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逐步实现“美丽中国”的远大目标。总之，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绿色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来源：《美丽中国视野下的绿色发展研究》2015 年 6 月 吴茵茵）

打造美丽中国样板区城市案例

重庆“美丽山水城市建设”的实现路径

重庆主城区位于我国长江中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地带，以大江、大河重要水系为骨架，具有保障长江中下游人口和经济密集地区生态

安全的重要作用，维系着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安全。重庆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山地滨江城市，其城市空间不但跨度大，而且用地类型极为复杂。随着党的“十八大”对“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2013年重庆提出要建设“美丽山水城市”，其内涵包括“突出生态之美”“彰显文化之美”“塑造形态之美”。重庆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山地区域)、特别的发展阶段(欠发达地区)和关键的地理区位(三峡库区、长江上游)决定了城乡发展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在空间资源利用、城镇空间拓展中而面临较大的压力与挑战。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如何维持自然山水的风貌、维系城市与乡村的和谐关系，利用山水资源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现代山水园林城市，体现“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是重庆主城区建设“美丽山水城市”的核心与关键所在。

山水与城市之间的关联源远流长，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东方文化背景，《论语》中有一句名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体现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山水情结”。山水与城市的结合，是人类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建立起一种共生、共存、共荣的协调关系，实现动态平衡的演变过程。在我国现代城市建设历程中，关于“山水城市”的具体构想，最早是在1990年由钱学森提出的。这一理念曾经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引领了城市发展的一股浪潮，近年来逐渐衍生出“生态城市”“绿色城市”等新兴概念。随着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等字眼的浓墨重笔，对山水、田园式的城市发展理念的回归或将成为一种新趋势。

与我国传统哲学的“山水城市”理念相对应的是西方哲学思想中的“田园城市”。“田园城市”的概念最早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要追溯到1898年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规划理论。如同西方哲学思维体现人文关怀的“田园城市”梦想一样，“山水城市”是东方哲学思维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理想城市形态和发展模式。可以说，在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方面，东西方的追求是一致的。然而，“山水城市”的理念不是简单地展现自然山水风貌，“田园城市”也不是简单地将城市和乡村编织在一起，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将人工创造的城市环境融入到自然的山水、田园环境之中。显山、露水、营城、

造绿只是一种表征，其内涵是城市、人与自然达到一种共生、共融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可以随着城市的生长而进行自我调节。



重庆主城区生态本底分析及城市空间历史脉络

重庆主城区生态本底分析

由绍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和长江、嘉陵江组成的“四山、两江”，构成了重庆主城区大山、大水的本底特征。其中，山地面积占 41%，丘陵面积占 50%，平坝和台地面积占 6.7%。两江交汇、群山环抱的自然山水格局使得重庆的城市空间形态呈现出不同于《周礼·考工记》所要求的规整布局的形态特征，其选择了尊重、顺应自然山水环境特征的朴素生态意识进行城市空间形态的布局。

重庆主城区内相对复杂的地理环境要素构成了其城市景观的异质性和形态的多样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市建设的难度，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制约，但是这种复杂的山地自然环境为山地城市带来了鲜明的特色之美。

重庆主城区山水空间形态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城市的山、水、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来说，重庆主城区山、水、城空间格局的历史演变大致经历了“起

步发展——稳步拓展——快速发展”二个阶段。

（1）起步发展阶段。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重庆的城市建设集中在中梁山、铜锣山两山之间，空间形态上分为两大块：嘉陵江以南、长江以西包括渝中半岛、瓷器口和杨家坪等在内的中部组团；长江以北包括江北城、五里店和观音桥等在内的北部组团；长江以南包括南坪、弹子石等在内的南部组团。此阶段的城市山水形态表现为“山水分城”——城市建设集中于两江交汇处，以大山、大水为地理分割单元，山水成为城市的增长边界，乡村、小城镇环绕在城市外围，呈现明显的梯级分布特征，初步形成“山水城市”的轮廓，城市与周边乡村、小城镇同步协调发展，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各自独立发展的形态。

（2）稳步拓展阶段。从改革开放至重庆直辖之前，随着一批跨江桥梁与穿山隧道的修建，使长期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最终得以打破。山、水、城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两江”发挥了分隔组团的作用，城市从“沿江”发展变为“拥江”发展，城市发展进入中期阶段。此阶段的城市山水形态表现为“山水入城”——城市组团不断向外延伸，主要沿着“两江”与主要轴线拓展，大山、大水与城市相伴而生，城市与小城镇的建设稳步推进，对乡村地区形成较强的单向吸引作用。

（3）快速发展阶段。自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随着城市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加之内环快速路、二环高速公路的相继通车，重庆各组团之间的快速交通联系基本成型，城市的空间战略由“跨过两江”向“越过两山”推进，传统的山、水、城格局正经历新一轮的转变，多中心、组团式的山水城市空间形态得以进一步强化。此阶段的城市山水形态表现为“山水融城”——城市组团分布在“四山”之间的二个槽谷中，大山、大水融入到城市之中，以生态和景观为主导功能，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规模拓展迅速，小城镇与乡村数量逐渐减少，但是与城市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吸引、包裹式的发展形态（图1）。至此，重庆主城区的城市空间明显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一岛、两江、两山、一线（中央山脊线）”的山、水、城格局，向着更大范围的“一岛、两江、二谷、四脉”的山、水、城、乡互动发展的格局

演变。通过内环高速公路、绕城高速公路（二环）和轨道交通的联系，重庆主城区形成“小分散、大聚合”的组团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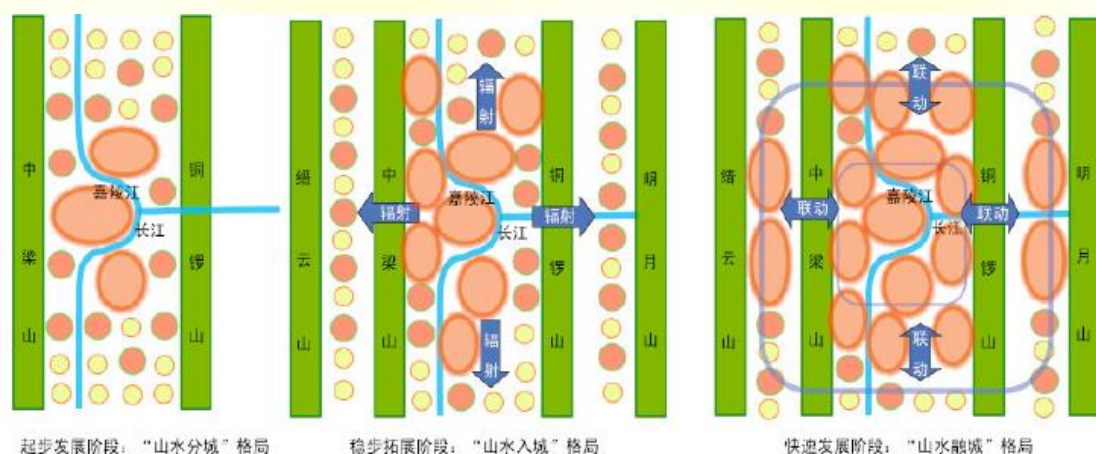


图 1 重庆主城区山、水、城、乡空间格局演变图

重庆主城区建设“美丽山水城市”的实施路径

严守本底：划定生态红线与城市增长边界

1、资源评价：依据资源承载能力。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对重庆主城区内各类生态要素进行分析，依据高程、坡度、地质灾害及各类政策保护区等限制性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判断城市建设用地的适宜性与综合资源承载能力，因地制宜地安排城市功能，组织城市空间。经分析，重庆主城区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 26%，可建设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 9%，不宜建设用地占总用地面积的 29%，禁止建设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 36%。

将适宜建设用地和可建设用地确定为主要的生产、生活空间，同时结合水资源承载能力和大气环境容量评价，最终划定重庆主城区的城市增长边界，范围约 1 800 平方千米，占重庆全域的 1/3，极限承载人口为 1 500 万—1 600 万。结合城市发展的实际，可以确定 2020 年重庆主城区城镇建设用地为 1 188 平方千米，城市人口约为 1 200 万。

2、红线划定：综合各类要素划定生态红线范围。将禁止建设用地和不宜建设用地确定为生态空间，通过绿线、蓝线的划定，明确保护和控制边界。在绿线划定方面，重点划定 7 个自然保护区、8 个森林公园、11 片重要的风景林地、21 座城中山体和 2 条城市山脊线的

保护控制范围。规划将该区域定位为城市生态功能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和休闲娱乐的基地。在蓝线划定方面，重点划定“两江”（长江、嘉陵江）、主要次级河流（御临河、五布河、梁滩河、箭滩河、黑水滩河、后河、花溪河等）、70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保护控制区域。规划将该区域定位为集生态、景观于一体的生态涵养基地。

延续文脉:构建山水生态路线建设图

1、宏观层面：维系大山、大水生态格局。以山脉、江河为主骨架，在区域尺度上构建景观生态体系，将大山、大水的生态基底融入城市之中，形成“山水、人文、城市”三位一体的现代生态融合体，通过山水的阻隔将城市体分散成若干块，避免地毯式的全面高密度开发。在有效控制重庆主城区城市形态的过程中，在城市扩展轴之间、中心城和新城之间、新城和小城镇之间留出足够的大山、大水绿色空间，形成生态绿楔。结合区域功能绿化环境，打造城市形象，通过生态农业、绿地和绿带等的有机串联，形成聚集与分散辩证共存、城市与乡村优势互补的“田园城市”结构。

2、中观层面：控制预留重要生态廊道。在重庆主城区城市空间管制中，重点控制“两江、四山、多廊道”的生态廊道，通过组团隔离带连接“四山”区域，形成完整的绿色廊道和水系网络。引导城市形态沿交通轴线指状发展，保留城市中自然的地形分界线和高低起伏的整体轮廓，恢复和保护长江、嘉陵江及支流谷地的自然景观，并将城市绿地系统延伸到城市指状发展的扇形间隔面中。同时，中梁山、明月山、绍云山、铜锣山以及寨山坪、樵坪山等余脉向城市呈楔形延伸，与城市绿地系统共同形成轴间开敞空间，并结合郊野公园的打造形成十大重要生态功能区。

3、微观层面：营造小山、小水生态网络。注重城市内部小山、小水的细节塑造，建立点、线、面结合的开放空间系统。重点整治23条次级河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将滨江、滨水、沿山地带的建筑风貌、广场、公园、历史街区、消落带及滨江路进行统一考虑，以滨江路、“两江”水系为主线，沿线的节点和块状绿地与主线形成互动和联系，形成一个链状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构建空间收放、开合有致、山水转折、起伏变化的有机开敞空间网络。通过空间

的分割和围合，串联公园绿地体系中的点、线、面，与大山、大水的生态基质和生态廊道构成交相辉映的生态体系。

功能渗透：构筑山、水、城共融的空间体系

1、合理划分功能分区，实现城乡共融、城市与生态和谐共生。根据发展基础和条件的不同，可以合理配置城乡空间资源，规划城乡功能空间，重构区域城乡空间关系。城市空间可分为生态发展区和城市发展区两大板块。

生态发展区包裹着城市发展区，对城市增长边界进行合理控制，发挥独特的山水资源优势，将城市融入区域生态空间。同时，将主城区空间规划置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框架内，将河流谷地、森林绿地和农田作为生态、景观和休闲地带加以严格保护，使自然天成的绿色空间与建成空间相互渗透。

城市发展区由城市组团与生态功能区块镶嵌而成，生态功能区块穿插于城市功能区之间，维持良好的生态格局。城市发展区由核心城市与外围新城组成。核心城市主要由内环以内的区域构成，与重庆五大功能区战略的都市功能核心区基本一致；外围新城则由内环与外环之间以及外环沿线的重要区域构成，与重庆五大功能区战略的都市功能拓展区基本一致。通过将重庆主城区的山水结构与五大功能区的定位进行匹配，构建“紧凑型城市，开敞型区域”的网络型开放式复合生态系统，形成“山水融合、城乡协调”的开放式空间结构（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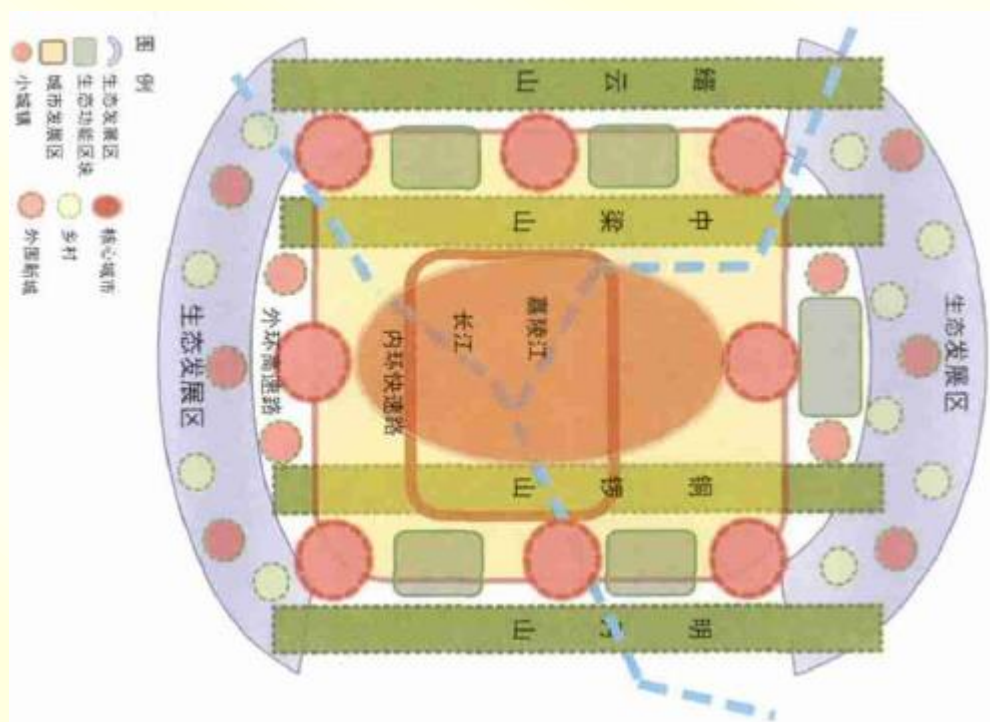


图 2：重庆主城区“美丽山水城市”理念图

2、延续多中心组团式模式，构建空间开放的区域城市。多中心组团式模式是重庆主城区城市空间结构的特色，是被实践所证实的既能保持大城市效率，又能杜绝相关“城市病”的良好模式。在城市功能分区的基础上，重庆主城区对城市发展区进行细化，结合山水生态路线图的构建，维持“两江、四山、多廊道”的生态本底，以“两江、四山”为骨架，完善“一城、五片、多组团”的城市格局，保持和延续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结构。同时，重庆主城区选择跳跃式发展模式，在中心城市外围明确城市优先发展方向，使城市建设重心从中心向外围转移，依托城市内部次级山体、水系，形成城市建设版块与自然开敞空间有机融合的组团式空间布局。

总体上看，规划布局 21 个城市组团，其中部分组团培育城市综合职能，部分组团培育相对突出的专业化职能。组团之间能够在功能上相互关联，便于形成多核网络化结构，并能够根据发展的需要，保持整个区域城市的开放性，预留将来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3、以新城建设为依托，引导城市空间有序拓展。根据功能集聚的需要，在 21 个城市组团中规划布局九大新城，通过维系山水生态

格局，以外环高速公路为纽带，推动新城的建设，实现重庆主城区由分散发展向整体发展的全面转变。新城的建设将主要通过大型聚居区的带动和相关配套产业的引入来实现。以大型聚居区为推手，可以带动外环地区的新城发展，大型聚居区尽量与产业园区毗邻，按照职住平衡和方便市民生活、工作的原则进行布局。

通过疏密有致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可以继续提高都市功能核心区的上地综合资源效益，发挥核心区的主导功能。同时，积极发展都市功能拓展区，强化组团式、多中心的布局，提高生态环境品质，加快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在区域空间中使城镇体系结构更趋合理。

结语

对美的追求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理想。从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出发，自然即为美，美的本质是自然。这种自然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也就是我国哲学中所说的“道”。按照这一审美标准，“山水城市”“田园城市”等都属于“美丽中国”的范畴。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没有特定的模式和可供复制的母版，但“道法自然”是必经之路。每一座城市的形成、存在和发展，都是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紧密相关的。只要是符合城市的自身特色、顺乎城市的发展规律，就能走出一条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城市与自然交相辉映的美丽之路。重庆的“美丽山水城市”建设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所进行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贯穿于城市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重庆主城区在空间演变过程中一直遵循“多中心、多轴线、组团式”、“小分散、大聚合”以及珠链式发展的紧凑城市形态模式。实践证明，无论是局限于“两山”之间的初步发展阶段，还是跨过“两江”与“四山”走向更大区域的成熟发展阶段，这种模式是符合重庆山水特色的，是一种符合东方山水哲学和西方“田园城市”理想的实施路径。其与成都的“世界田园城市”、武汉的“山水园林城市”及天津的“生态城市”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对“美丽中国”建设的一种诠释和实践。

（来源：《规划设计》2014年第6期第30卷 曹春霞）

美丽中国建设样本——美丽杭州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美丽中国”不只是生态美丽。而是要以生态文明的理念、方法和路径。以美丽为重要优势及核心资源，以“五位一体”相互协同、相互和谐为桥梁。最终实现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高度统一的“永续发展”。要“美丽”也要“发展”，“美丽”与“发展”互促，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新常态”下中国发展模式的新解读。



提炼杭州“个性美”

建设美丽杭州。首先是要在全球城市的参照系中来寻找“美丽”城市的“共性美”。确定“美丽发展”的核心内涵；并以杭州独特的“个性美”为基础，寻找与杭州禀赋与路径最为接近的目标城市。设定杭州“美丽发展”的蓝图愿景。

杭州之美，古有风华。杭州的“个性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和谐之美。体现于杭州自然景观中的山水相依、城市景观中的城湖合璧、社会生活中的和谐共生与精神气质中的天人合一；二是精致之美。体现于城市产品的精工细作、城市空间的精细巧思、城市生活的精致艺术；三是繁荣之美。从吴越时期的东南第一州

“到北宋时期的全国四大商港之一，南宋时期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再到元代“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杭州一直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人间天堂为名，如图 1。

图 1 全球共性美和杭州个性美
美丽发展的杭州愿景



以“五位一体”的发展要求为引领。以实现共性美“发扬个性美”为导向，参考目标城市的发展路径。从生态、生活、生产、空间与文化的和谐发展等方面提出“美丽杭州”。山川秀美、生活和美、功能臻美、空间精美和文化醇美的“五美融合”新愿景。

（1）山川秀美即生态环境优越、关注可持续发展、山水城林风光秀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生活和美即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社会和谐、生活幸福；

（3）功能臻美即产业创新、繁荣、有活力；城市功能强劲，运行有效；

（4）空间精美即城乡空间布局紧凑、宜居适度、设计建设精美、人性化、有品位、特色彰显；

（5）文化醇美即发扬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氛围，鼓励创新，文化多元包容。

美丽杭州的战略导向

结合“美丽中国建设的样本”这一国家战略层面的城市发展目标，从“美丽”的高度、“美丽”的深度“美丽”的广度三大视角来重塑城市战略定位。围绕“美丽”这一核心竞争力来引导杭州城市发展。

“美丽”的高度——国家首美之地

“美丽发展”高度视角下，需对“美丽”话语体系下城市发展的地位进行重新评估。从城市发展不同时代的特色来看，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是高消耗、高排放、人口和资源高度集中的企业型城市，而生态文明时代的城市受到依托互联网的资源虚拟配置模式影响，将往低碳循环、资源交换和人口交往加快的平台型城市发展。城市体系的构建模式，价值取向不再纯粹是地理区位、城市规模和 GDP 总量的排序，而是低碳高效、高端服务发展绩效的综合比较。杭州是全国第一个以“美丽”为发展战略的样本城市，有机遇也完全有基础以“美丽发展”抢占先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示范。因此应当将“国家首美之地”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品牌。

“美丽”的深度——创造智慧之都

“美丽发展”深度视角下，需对“美丽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行剖析。城市经济繁荣是解决就业、改善民生塑造品质的基础。而在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影响下，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模式不仅在生态上难以为继，经济效益也逐渐走低，中国速度一再降速。杭州一方面推动产业创新，从制造转向“智造”、从生产转向服务、从企业转向“平台”。另一方面利用阿里巴巴、网盛生意宝等国内外知名电商平台的基础优势发展电子商贸物流，2014 年实现了经济增速的回升。“创新经济”和“智慧经济”低碳高效的发展模式，将成为杭州“美丽发展”的直接动力，因此以“创新智慧之都”来体现杭州城市“美丽发展”的关键特色。

“美丽”的广度——东方品质之城

“美丽发展”广度视角下，需实现“美丽”品质的共建共享。杭州早在 2006 年就提出了“生活品质之城”的重要战略，当时主要针对城区建设。之后又相继提出了城乡统筹、风情小镇、美丽乡村、美丽县城，形成“城市——县城——小镇——乡村”的“美丽发展”

四级战略体系。即将“美丽发展”的广度从城区拓展到了整个市域。提出“东方品质之城”的城市发展定位，与“美丽”为全社会共享成果这一思路一脉相承也是对杭州历来城市发展核心战略的回归、总结和拓展。

“美丽”愿景的衍生策略

以山川秀美、生活和美、功能臻美、空间精美和文化醇美的“五美融合”新愿景为导向，对应提出五美策略，并将五美策略进一步转化为十大行动，策略与行动之间形成相互影响作用的互联关系。

1、生态环境明秀美策略

生态环境明秀美策略由“山川秀美”愿景衍生，核心是“筑本底、巧布局、强保护”。即以保护杭州城市既有山水本底为基础，构建串联多层次、多功能的生态网络体系，充分发挥生态空间的整体功能，彰显生态景观特色，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支撑与相互促进作用。该策略的主要内容为生态保护与修复，转化为生态维育行动。

2、人居生活和乐美策略

人居生活和乐美策略核心是“服务均等、职住多元、管理创新、交通畅通”，以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和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公众参与，提升城市政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该策略包含交通、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三方面的工作内容，分别转化为公交都市、服务均等、和谐治理三大行动。

3、功能产业活力美策略

功能产业活力美策略的核心是“明定位、聚要素、筑平台”。以提升活力、增强动力为目标，进一步发挥竞争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充分激发创新能力。该策略一方面包括对现有城市功能的提升转型，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创新与智慧两大发展要素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转化为功能提升和创智城市两大行动。

4、城乡空间品质美策略

城乡空间品质美策略的核心是“城乡协调、结构优化、集聚高

效”。以营造优质高效的城乡空间环境为目标，构筑网络均衡的城乡关系，优化城市布局结构，促进空间资源高效集约利用。该策略包括城乡空间关系、城市空间、乡村空间三个层面的内容，转化为网络都市、花园城市、美丽乡村三大行动。

5、文化景观精致美策略

文化景观精致美策略的核心是“保护文化遗产打造魅力街巷营造精致空间”。以加强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与提升为目标，延续城市文脉，传承城市文化精神全面提升城市魅力。该策略的核心为文化的保护、延续和发展，转化为文化繁荣行动。

“美丽杭州”的行动平台

在“美丽杭州”行动的设计上，以问题为导向设计行动的基本框架，针对现状核心问题提出工程项目，采取指标型、提升型、突破型三种行动模式推进工程实施。

1、“指标型”行动工程

生态保育行动采取“指标型”的行动设计方法，以精细量化的数据指标要求来指导行动工程。

生态保障工程

杭州市作为经济大市、资源小市，生态环境承载的本底条件比较脆弱，环境容量极为有限。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空间拓展的矛盾比国内其他城市更为突出。目前生态空间保护控制规划实施的主体不明、责任不清、机制不健全，生态空间遭到一定程度的蚕食。

针对这一问题现状，提出生态保障工程。工程指导指标为：严守占市域总面积 90%、面积为 14930km 的生态保育空间。

环境质量工程

杭州单位 GDP 能耗为 0.58 吨标准煤/万元，远高于国内先进城市和世界平均水平；年均灰霾天数达到 160 天左右，机动车尾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钱塘江和东苕溪两大流域水环境质量功能区达标率不高，城市大部分河道水质仍劣于Ⅴ类。局部地区存在土壤污染。

针对这一问题现状，提出环境质量工程。包含饮用水提质、水环境改善、空气洁净三方面的环境质量提升指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出厂水、龙头水水质达标率 100%；供水普及率 100%；工业

废水排放达标率 100%；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大于 95%；全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100%。全年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一级(优)、二级(良)的天数比例>98%；城市气化率 100%；工业(包括三产的各种炉灶)废气达标排放率 100%。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中水回用率达到 20%。

2、“提升型”行动工程

服务均等行动采取“提升型”的行动设计方法，即以对现状情况的改善提升为目标来指导行动工程。

公共中心提升工程

杭州市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等类别的优质资源过度集聚于老城区、副城、组团公共设施建设滞后，无法满足组团式发展的社会服务需求。在主城层面，城北缺少副中心，中心体系有待完善；在副城层面，副城公共中心规模偏小、服务能力偏弱，难以满足更高的服务需求；在组团层面，组团级公共中心的建设则仍处于初级阶段。

针对这一问题现状，提出公共中心提升工程。主要包括引导主城的文教体卫优质资源向副城与组团扩散，结合地铁站点开发更新老区、优化新区，采取加强停车系统、公交系统、慢行系统、标识系统的配套以改善公共中心可达性等提升改善型措施。

美好社区建设工程

杭州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二胎政策实施带来的新生“婴儿潮”对养老设施和幼教设施提出了新要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人际交往、业余活动、精神生活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现有的公共服务设施难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而城区逼仄的建设空间又难以新增设施的形式来增加服务。居住区块先行开发与群众反对“紧邻”家门口的邻避设施建设也带来社会矛盾。

针对这一问题现状，提出美好社区建设工程，推进资源挖潜利用，满足各年龄段居民需求。学校的体育场地与社会、社区与单位的停车位错时借用共享；社区活动场所兼容幼儿与老年人需求；新建小区架空层设计为社区活动场地。老小区住房底层加以改造功能置换为社区服务用房；建设口袋公园等，丰富社区交往空间。新建居

住区块要求幼儿园，小学，农贸市场，公交设施及线路等配套设施与住宅捆绑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

“突破型”行动工程

公交都市行动采取“突破型”的行动设计方法，即以公共交通的建设为抓手定点突破，来改善城市的整体交通环境。

公交提速工程

截止 2013 年 4 月，杭州六城区机动车保有量 98 万辆，千人拥有率为 270 辆，居全国首位。交通拥堵日益严重，出行难、停车难已成为困扰杭州市民日常生活工作的主要问题。而公交站点少，速度慢又是公共交通发展的瓶颈。

针对这一问题现状，提出公交提速工程。在轨道交通服务不足区域延伸和加密 BRT 线路，增加公交专用道，配合轨道交通和城市综合交通枢纽运营优化公交线路，尽可能地增强慢速常规公共交通和快速轨道交通的接驳能力。

景区畅行工程

西湖文化景观成为世界遗产后，游览交通量和出行服务品质需求进一步提升。西湖独特的城湖一体格局使得景区交通与城市交通相互影响。而景区道路停车空间有限，游客交通需求集中得小汽车主导的景区游览模式难以为继。

针对这一问题现状，提出景区畅行工程。完善景区周边的机动车停车换乘中心，截流进入景区的机动车；优化景区公交线路，确立景区公交主导的游览交通体系；加密景区内部特色线路，发展景区水上巴士、景区绿道、景区电瓶车等多种行游合一的服务模式。

（来源：《城市规划》 2015 年第 39 卷 杨毅栋 高群 潘蓉 洪田芬）

转变发展方式——建设美丽中国的厦门样板

厦门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发展速度换挡、动力转换和结构调整是当前最大的实际和最突出的问题。保持战略定力，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当务之急。面临新形势、新要求，探索转型发展的路子尤为迫切而重要。近年来，厦门市委、市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努力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

效益提升，建设美丽厦门，使之成为美丽中国的样板。

我们的思考——坚持转型发展走新路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科学判断，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然过程。

（一）老路已经走不通

进入“十二五”以来，厦门发展的情况已明显体现老路已经走不通。具体表现在：一是经济增速逐年回落。2012—2015 年生产总值分别增长 12%、9.4%、9.2%、7.2%，尽管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远低于特区建立以来 16.3% 的年均增速。二是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传统产业发展难以为继，新兴产业正处于培育发展时期，新旧动力转换接续尚未到位。三是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单中心的城市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岛内外发展不均衡，优质公共资源仍集中在岛内。四是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利益格局多元、收入差距拉大等导致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复杂，信访量居高不下。五是城市生态环境日趋脆弱。城市人口规模持续扩张，空气、水环境质量有所下降，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期望和诉求日趋强烈。综合分析，以代工为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投资驱动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靠特区优惠政策形成的“政策洼地”已经弱化。人与自然之间，产业、城市与社会之间，岛内与岛外之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不同程度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等等。总的来说，厦门过去成功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型。

（二）新路需要抓紧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洞悉国内外形势变化，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总书记曾于 1985—1988 年在厦门工作 3 年。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主持编制了《1985—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02 年 6 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调研时，对厦门的发展做出全面系统指示，提出“四个结合”发展思路，即：坚持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坚持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坚持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坚持把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把厦门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性花园城市。2014 年，习总书记来闽考察时，指示福建要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努力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因此，要实现厦门的转型发展，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面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变化和创新驱动发展规律的要求，需要激发内生动力；二是面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需要增强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生长性。把自己的“好”做得更好，激发内生发展动力转型发展的关键是准确把握城市特质，把自身的“好”充分发挥出来，并转化为汇聚资源和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

（1）厦门的“好”，突出体现在城市的“美”，为此要发挥人居环境优势，集聚和培育创新人才。厦门是一座值得作为家的城市，自然环境宜人宜居，人文环境开放包容，市民由衷热爱自己的城市，五大发展相对协调。这一优势对人才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要进一步提升有利于人才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构建良好创新生态圈。

（2）厦门的“好”，突出体现在一直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为此要发挥对外开放优势，提升国际化水平。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有效汇聚并整合资金、技术、管理等高端要素，是厦门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关键。要进一步发挥长期积蓄的改革开放优势，积极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构建国际要素汇聚平台，扩大城市国际影响力。

（3）厦门的“好”，突出体现在两岸交流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为此要发挥对台优势，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厦门经济特区因台而设，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支点城市。必须着力打造两岸经贸合作最紧密

区域、文化交流最活跃平台、直接往来最便捷通道、同胞融合最温馨家园、民间交往最亲密基地，才能不负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

（三）在统筹发展上下功夫，增强城市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生长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科学方法论。”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必须在统筹上下功夫。

（1）统筹是处理城市复杂的巨系统问题的重要方法。只有统筹处理好全局与局部、远期和近期、条条和块块之间的关系，才能增强城市的整体性、协调性和生长性，激发城市各子系统的内生动力，增强城市发展的动力。只有统筹发展，才能实现节约集约发展、错位差异发展、全面协调发展。

（2）空间规划是统筹发展的重要抓手。空间是“五位一体”发展的载体，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增强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生长性，是实现“五位一体”发展的重要路径。为此，厦门市委、市政府以统筹发展为抓手，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努力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发展观念上，由突出经济建设向实现“五位一体”发展转变；在发展路径上，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转变；在经济发展上，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向基于市场导向的创新驱动转变；在社会治理上，由政府包办向协商共治转变；在政府管理上，由部门管理向综合管理转变。

我们的实践——推动规划创新谋统筹

（一）以“统筹规划，规划统筹”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管理体系的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限定城市发展的边界，划定城市生态红线，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实践中，厦门市委、市政府以“战略规划”为基本遵循，实现“统筹规划”，构建“一张蓝图”，做到发展目标、空间坐标、用地指标“三标衔接”；以“多规合一”为基础平台，实现“规划统筹”，做到“一张蓝图”干到底。以此为切入点，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管理体系转变，实现转型发展。

1、以战略规划为引领，构建城市空间规划体系

(1) 构建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战略规划是对一个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发展做出的全局性、长期性、决定性的谋划，是一项综合性的规划。战略规划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是通过战略规划，落实中央的精神。按照中央确定的总目标，结合城市实际，明确发展愿景与目标、思路、举措。二是通过战略规划，构建理想的的城市空间形态。城市空间的山、水、城格局具有稳定性，特别是城市的生态系统是城市整体性、系统性和生长性的基础。三是通过战略规划，确定人口与资源安全底线。实现城市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确保人口与经济发展结构、与资源结构相适应，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通过战略规划，形成“共识”，实现从部门管理到综合管理的转变。改变传统的以“条条”为主的部门管理，建立“条条”和“块块”统筹协调的综合管理体系。五是通过战略规划，为“多规合一”提供基本遵循。整合各类规划，形成覆盖全域的“一张蓝图”，建立基本的空间规划原则。首先，突出以战略规划为引领，把“十三五”规划作为落实战略规划的阶段性安排，以解决五年规划缺乏长远规划作为指导的问题。其次，增强“十三五”规划的空间属性，使城市战略与具体规划相衔接，使规划落实到项目上，使项目得以落地。再次，指导城市发展年度计划的制定。构建以“战略规划——‘十三五’规划——年度计划”为主体的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

(2) 美丽厦门战略规划。2013 年，厦门市委、市政府组织制定了《美丽厦门战略规划》。在此过程中，着力提高规划编制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水平。一是民主决策。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征集 3.2 万余条意见和建议，其中 1302 条被吸纳。二是科学决策。组织开展 19 个专题调研，多次召开专家研讨会，就战略规划的制定、实施、评估和修订进行研究。三是依法决策。战略规划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主要内容包括：“两个百年”愿景：到建党 100 年时建成美丽中国的典范城市，到建国 100 年时建成展现中国梦的样板城市。“五个城市”目标：在国际层面上，建设国际知名的花园城市；在国家层面上，建设美丽中国的典范城市；在对台层面上，建设两岸交流的窗口城市；在区域层面上，建设闽南地区的

中心城市；在城市层面上，建设温馨包容的幸福城市。三大发展战略：国际化战略、空间发展战略、人的发展战略。十大行动计划：产业升级、改革创新、开放发展、城市提升、幸福安康、文化繁荣、生态优美、同胞融合、法治厦门、从严治党。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任务要求：人民城市人民建，通过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实现文明城市与文明市民共同成长，探索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3）厦门市“十三五”规划纲要。与传统的五年规划相比，厦门市“十三五”规划的主要创新有：一是在规划定位上。“十三五”规划是在《美丽厦门战略规划》的框架下制定的，是“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具体化，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阶段性安排。二是在发展目标上。“十三五”规划提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争当全国“五大发展”示范市，建成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的目标。首次将人类发展指数（HDI）与地区生产总值一同列为核心指标，民生福祉和生态环境指标占全部指标的比重达 60%。三是强化空间属性和项目支撑。将规划确定的各项重要任务落到空间布局图上，并与“多规合一”平台对接。对投资计划的编制方式进行改革，搭建了全口径、全生命周期的项目策划、生成和管理系统。

（4）2016 年度计划。围绕战略规划确定的十大行动计划，在五年规划的基础上，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报告，编制年度计划，将五年规划目标任务落实到年度工作中。

2、以“多规合一”为平台，构建城市空间治理体系

“多规合一”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和空间治理体系，推动经济发展管理体系转变，实施统筹发展的平台，是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改革，可以有效解决规划“打架”、加强资源环境利用和保护、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落实公众参与监督等问题。厦门市“多规合一”具体工作包括四个“一”，即一张蓝图、一个平台、一张表、一套机制：

（1）整合“一张蓝图”。以《美丽厦门战略规划》提出的城市理想空间形态为指引，统筹整合各个规划，统一各类图纸坐标系，形成覆盖全市域的“一张蓝图”。主要内容包括，确定生态控制

线、城市开发边界、城市空间容量及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在形成“一张蓝图”的基础上，对全市 50 多项专项规划进行统筹协调，进一步细化了 640 平方公里城市发展边界和 981 平方公里生态控制线内容。

（2）构建协同管理“一个平台”。首先，基于“一张蓝图”，搭建了全市统一的空间信息管理协同平台。全市已接入 76 个市、区部门，纳入城乡规划、国土、发改、环保、海洋等七大类 28 项专题图层。依托协同平台，将建设项目报建审批由部门管理向按建设项目建设流程管理转变，分为可行性研究及用地规划许可、方案审查及工程规划许可、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及备案等五个阶段。第二，建立以业务协同平台为基础的项目生成机制。在项目策划阶段就落实项目的投资、预选址、用地指标、环保等条件，推进项目可决策、可落地、可实施。两年来，市区两级共策划项目近 800 个。

（3）推行“一张表”受理。全面推动审批制度改革，变过去串联式审批为并联式审批，变“1 对 N”为“N 对 1”，变多环节多层次为扁平化高效率。财政投融资项目从启动到核发施工许可证的审批时限由 345—532 日压缩到 147—196 日，社会资本投资项目从 202—305 日压缩到 134—166 日。

（4）创建“一套机制”。杜绝体外循环，梳理规范前置审批和中介服务，做到全流程、全覆盖。2015 年减少审批服务环节 34%，取消中介服务事项数 40%。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推进各部门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实现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从“严进、松管、轻罚”向“宽进、严管、重罚”转变。发挥特区立法权优势，2016 年 4 月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厦门经济特区多规合一管理若干规定》，并配套建立了部门协调运行机制和监控考核、动态更新维护等制度，使“多规合一”的实施有了法规制度保障。

（二）以“美丽厦门共同缔造”推动城市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厦门市按照中央的要

求，开展“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实践，探索完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水平，促进新形势下城市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

1、有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地方治理来说，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基本治理单元的问题，也就是基层基础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人口大量流动，过去的基本治理单元实际上已经很难发挥作用。所以，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地方来说，就必须重构基本治理单元。社区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场所，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不仅包括居住问题，还包括服务、教育、治安、娱乐、精神等多方面的因素，既包括硬件也包括软件，是一个“完整社区”。通过“完整社区”的建设，从微观层面入手，进行社会的重组；通过对人的基本关怀，重塑社会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推动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开展“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实践的基本出发点。

2、共同缔造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基本原则是“核心是共同、基础在社区、群众为主体”。主要内容有：

（1）创新政府治理。一是简政放权，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厘清政府职责与居民自治边界，厘清街道与区级部门、与社区的职责分工，开展简政放权和为村（居）“减负增效”。二是改进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实行“以奖代补”，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全市共实施“以奖代补”项目 932 个，总投资 3.41 亿元，其中群众自筹资金 1.28 亿元。三是健全服务网络，让服务进家入户。全市共建成 403 个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 and “i 厦门”、“社区云平台”等一批智慧社区服务平台，建立 468 个村居综合便民服务站，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门式”公共服务。

（2）激发各方参与。一是搭建载体平台，吸引群众参与。从百姓身边的小事、房前屋后的实事做起，让群众有意愿、有平台、有途径参与共同缔造。群众义务投工投劳达 7 万多个工日，自愿无偿拆除旧房、猪舍等用于公益事业 48 万平方米。二是培育社会组

织，发动群众参与。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器，培育了一批社会组织，吸引大量居民参与，成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骨干力量。目前全市登记备案社会组织 3053 个，注册志愿者 45 万人。三是统筹各方资源，拓展群众参与。成立同驻共建理事会、社企共建理事会等各种组织和平台，着力解决资源分散问题，形成了共治合力。四是完善制度机制，保障群众参与。完善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完善社区事务协调会和社区民主监督评议委员会、“志工 + 社工 + 义工”的志愿者服务等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和社区服务机制，使群众参与制度化。

（3）突出对台特色。一是积极促进和吸纳台胞参与社区治理。成立有台胞参与的社区发展协会、乡贤理事会、社区听评会等，开展两岸同胞共同参与的社工项目。二是搭建台胞与居民互动和融入平台。鼓励和引导台胞参与社区服务，全市有台胞、台属参加的文体队伍 100 多支，志愿者 3000 多人。三是深化基层社区交流。全市 37 个镇（街）、21 个社区与台湾乡镇、村（里）开展交流，双方互相参观交流超过 5000 人次。

（4）塑造共同精神。一是培育对社区的认同感。通过社区美好环境、生态文化、特色文化等建设，培育对社区的热爱之情。二是锤炼社区公共精神。通过群众参与，锤炼“勤勉自律、互信互助、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的特区共同精神，促进新老厦门人相识相知，成为“一家人”。三是强化主人翁意识。通过共同缔造，推动群众和政府关系从“你和我”变为“我们”，居民行动从“要我做”变为“一起做”，社区建设从“靠政府”变成“靠大家”。

3、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治”的治理体系，把社区治理创新作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以共同缔造的理念和方法，以“完整社区”建设为载体，着力梳理政府、社会、市民的关系，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努力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治”的城市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1）“纵向到底”。就是党的领导到社区、政府的服务到社区，使党和政府深入人心。通过创新社区党建机制，健全社区党组

织核心主导机制，推行街道“大党工委制”和社区“大党委制”，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多元主体协商共谋、群团组织和党政部门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在职党员进社区、社区党代表工作室等机制，使党的领导扎根到社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在社区，党组织成为社区的领导核心。目前，全市 36 个街道和 216 个社区成立了“大党工委”和“大党委”；94 个市级单位挂钩村（居）参与治理，机关单位党员进社区服务达 20000 多人次。通过简政放权、改变政府服务管理方式，建立“以奖代补”和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等机制。同时通过加快“智慧社区”建设，整合社区网格管理、业务办理、综合查询、社区微信等 8 大功能，使政府服务进社区更到位、更便捷、更易互动。

（2）“横向到边”。一是把每个居民都纳入一个或多个社区社会组织。让每个居民在组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自觉参与组织的活动，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不断增强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形成人人关心和参与社区治理的局面。二是让每个充满活力的社区组织都有序参与社区治理，进而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凝聚多元共治合力。

（3）“协商共治”。就是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方法、制度机制，实现“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凝聚民意、民力、民智、民声和民心。

初步成效

（一）经济发展上

一是经济指标平稳回升。2015 年下半年起全市主要经济指标逐月回升。2016 年 1-2 月，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9.5%，财政总收入和地方级财政收入分别增长 16.9% 和 16.1%，厦门正逐步走出转型发展的换挡期。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13-2015 年，服务业比重提高 4.2 个百分点。2015 年研究与开发（R&D）占 GDP 比重接近 3%，两化融合发展指数 90.49，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 88.99。全市加快推进的十余条千亿产业链中，平板显示、金融服务、旅游会展 3 条产业链产值分别突破千亿。高新技术企业数超过 1000 家，占全省总数一半，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达到 65.9%。生物与新医药产值增长 17.8%，软件信息业务收入增长 23%，网络零售额增长 60%，登记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增长 21.8%，境内外游客突破 600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832.3 亿元。以软件信息、金融服务、旅游会展、生物与新医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重要新增长点。三是质量效益持续向好。2015 年财政总收入突破千亿，增长 10.2%。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42607 元和 17558 元，增速高于同期经济增长。四是创新活力不断增强。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到 65.9%，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成为全国首批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基地示范市。五是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对照世行营商环境评估标准，营商环境从全球 60 余名提升至前 50 名。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实施“三证合一”。

（二）社会治理上

一是社区人居环境更加温馨。92% 的居民认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改善了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打造了温馨和谐家园。二是社会更加和谐有序。2015 年全市刑事案件、八类案件和治安案件在前三年持续下降的基础上又分别比降 1.5%、20% 和 5.8%。三是社会活力有效激发。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许多老旧小区通过共治共管，破解了乱停车、占道经营等老大难问题。

（三）城市建设上

一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翔安机场加快建设，对外综合交通网络日臻完善；轨道交通 1—4 号线全部开工，初步形成串联六区、辐射周边的快速交通系统。二是“一岛一带多中心”的城市格局基本形成。启动环东海域东部新城、马銮湾新城建设，推进同安翔安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鼓浪屿综合整治提升成效显著，已被确定为中国申报 2017 年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三是城市保障能力提升。获批国家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试点，建成纳入综合管廊的市政管线 232 公里，建成公共自行车道 205 公里。四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2015 年空气质量在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二。岛外 9 条小流域治理全面推进，集中式饮用水源达标率 100%，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94%。

（四）党的建设上

一是基层党建得到强化。实施“党建富民强村”工程，基层党组织班子素质能力得到提升，村集体经济总量增长约 35%。非公企业党建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大幅提升，得到中组部高度肯定。二是党群关系更加融洽。2015 年，全市区级以上领导干部下基层办实事好事 10263 件，5 万多名在职党员结对帮扶困难群众 13381 人，75 个村（居）脱去经济薄弱村帽子，群众更加信任支持党和政府。三是干部作风进一步改进。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和厦门工作时提出的“四下基层”“四在一线”“马上就办”等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出台《市委常委会改进作风的意见》和《领导干部治庸问责暂行办法》等制度措施，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干部作风不断改进，履职能力不断增强，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干部群众对厦门发展的信心不断增强。

结语

（一）坚持党管规划

党委主要领导主责主抓，3 年来召开近 200 次市委常委会和市委专题会，为规划的有效落实提供了坚强保证。一是通过规划总揽全局。以规划统揽“五位一体”发展全局，明确产业、城市和社会治理三个转型的战略方向。以构建城市空间规划体系和空间治理体系为抓手，在全市范围内对产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重大工程项目的空间布局进行统筹协调，在宏观层面上确保转型发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二是通过规划协调各方。只有党委主抓，才能统筹协调各方利益，破除阻力，达成目标。以“多规合一”为平台，打破部门藩篱，实行“一张蓝图严格管控、一个平台协同管理”，再造了审批流程，提高了管理效率。三是通过规划落实政绩观。以《美丽厦门战略规划》为指引，编制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让“该干什么的地方干什么”，同时创新建立差异化的政绩和干部综合考核评价机制，让“能干什么的人干什么”。

（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一是把最好的资源留给群众，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坚持把群众的切身需求与政府追求发展的作为统一起来，把最好的资源留给群

众，扩大有效投资，补齐短板，提高了公共服务水平。二是突出群众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始终紧扣群众关心的切身需要，让群众走出来说出来做出来，变“要我做”为“一起做”，变“靠政府”为“靠大家”，实现了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三是重塑共同精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把塑造社区共同精神作为共同缔造的根本，从单纯为群众服务、给群众利益，转向凝聚群众共识、培育群众精神，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了社区、居民和具体事上。

（三）探索以规划为抓手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是转变理念思维，提升规划科学性，转变思维方式，自觉以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精准思维，把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转变规划理念，将规划作为推动转型发展的有力抓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促进转型。二是以规划明确转型目标，凝聚共识。当前社会利益多元、矛盾复杂，只有最广泛地凝聚共识，才能有效推动工作。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科学制定战略规划和“十三五”规划，汇聚了强大合力，绘就了事业蓝图。三是以规划总揽全局，协调发展。空间有序才能实现发展有序。利用规划将“五位一体”各类目标任务在空间上进行统筹布局，通过“多规合一”平台有效统筹各类项目，通过项目实施促进了规划落地。四是以规划统筹资源，推动转型发展。依据“战略规划——‘十三五’规划——年度计划”规划体系和“多规合一”平台构建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和空间治理体系，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统筹土地、人力、资本、创新等多种资源要素，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推动了转型发展。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2015年第8期 王蒙徽）

寿光——打造美丽中国的样板区

近年来，寿光市积极顺应发展形势，从环保优先走向生态自觉，全面打响“生态寿光”品牌，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三个产业围绕生态做文章

寿光市较好地解决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短期飞跃与长期发展的矛盾，成为江北地区唯一荣获“中国人居环境奖”的县级市。第一产业“种生态”。全力推进向绿色优质、种苗农业、生态农业转型，大力实施“沃土工程”，指导、鼓励农民使用有机肥、生物农药。第二产业“护生态”。以高端、高新产业为突破，全面加快寿北开发进程，规划建设先进制造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对入园项目行使“环保第一审批权”，污染项目、高耗能项目一律不要。第三产业“促生态”。大力发展市场物流业、生态旅游业，推动生态与旅游业互动发展、融合发展，连续举办了十五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实施了商贸城市建设，农产品物流园日交易量突破 2000 万公斤，成功发布“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三个环节保护环境

规划建设了双王城生态经济区，以局部地区生态建设的大突破，实现寿光整体发展层次的大提升。高起点定位，按照“生态、旅游、文化”的发展定位，以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为标准，全力打造知名的“北方湿地之城”，让双王城区域成为环渤海地区乃至全国生态建设的实验区和示范区；高标准建设，开工建设了总投资 58 亿元的湿地休闲度假中心、拒淀湖改造等 30 个生态旅游项目，全面扎起了生态开发框架；高速度推进，从土地、资金、人力、政策等方面全方位加大对生态修复的扶持力度，确保实现“三年大见成效”的既定目标，全力创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三大机制护航生态

抓发展不忘生态，靠绿化美化打造环境、用产业转型提升环境、凭监管整治保护环境，使持续发展有了可靠的环境保障。一是城乡环卫一体化。投资 1 亿多元，在所有镇街全部配备了垃圾中转站、运输车、垃圾桶及保洁员，将全市所有村庄和乡级以上道路均纳入环卫部门直接管理，建立了无害化垃圾处理体系，实现了“一把扫帚扫到底”。二是园林绿化一体化。目前，林木覆盖率达到 23.8%。三是污水处理一体化。实现了城镇污水处理全覆盖，同时，对境内河流进行了生态修复，成功创建为“国家生态市”。四是治污减排一体化。大力实施“三八六”环保行动，全市大气环境质量

明显好转。五是环境监管一体化。建成全省一流的环境监控中心，在重点行业、重点部位、重点企业全部安装了 24 小时在线监测系统，提高了环境监管和应急污染事故的处理能力。



效果好不好，关键在引导

机制保障、约束很关键。我们探索建立了“三大机制”。生态共建机制。借助媒体、信访的力量，充分发挥好群众的监督作用，形成了环保工作的“动车组”效应。同时，建立了政府负责、环保主打、部门协作、企业主体、群众参与的“五位一体”公众参与机制。多元投入机制。把生态建设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生态市建设，形成了“企业自筹、政府补助、社会参与”的多渠道投入机制。考核引导机制。制定出台《寿光市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及责任追究考核试行办法》，将环保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综合考核范畴，市政府分别与各相关部门签订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对完不成任务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并取消先树优资格，发生重大生态环保事故的，坚决实行“一票否定”。

（来源：《纪实》2014 年第 6 期 朱兰玺）

打造美丽中国样板区在仙居的探索和实践

绿色，引领经济转型

——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的“仙居路径”

这是一组令人惊羡的数字——

去年，仙居全县绿色产业增加值增长 15%，占全县 GDP 的 42.5%；绿色项目投资增长 18%以上，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10.5%，增幅居全市



第一。曾经的台州“臭老九”、浙江“经济洼地”，已成为浙江践行“两山”理论的排头兵、生态文明的先行区、绿色发展的样板区。

这一跨越，缘于仙居对绿色发展的道路自信和生态自信。县委书记林虹说：“绿色，是仙居最大的优势和潜力。”

近年来，仙居县坚持生态立县不动摇，一张蓝图绘到底，以绿色新理念谋划仙居未来新发展，全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县域绿色发展改革的“仙居模式”。

“明年，仙居绿色产业增加值占比有望达到 50%左右，城镇绿色化达到 60%以上，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全国先进水平。”林虹对仙居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坚持绿色有机，合理布局

打造绿色高端农业基地

这几天，浙江大学教师周建华“捣鼓”着他的新产品。“这是我前不久研制出的零添加工艺的铁皮石斛片剂，入口软化。”

周建华是浙江圣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三年前来到台湾农民创业园，租用 45 亩土地，从事铁皮石斛种苗培育。他研发的零下 50 摄氏度低温冻干技术，可以将杨梅、蓝莓、草莓等冻干，使之保存三年。“今年开始研发的深加工型铁皮石斛，明年底就可投产了。”周建华说。



与圣兰生物一样驻扎在台湾农民创业园的企业，如今有 27 家，协议总投资 26 亿元，示范推广的各类农业新品种 25 余类 150 多个，产业涵盖有机农产品生产、精品花卉种植、种子种苗研发、特色水果苗木种植等。今年上半年，该园区实现产值 6000 余万元，其中深加工产业收入 800 余万元，旅游收入 1200 余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25%、60%、20%，辐射带动该县农民人均增收 1300 多元。

近年来，仙居围绕打造中国最高端农业的目标，坚持绿色、有机方向，以台湾农民创业园为平台，依靠科技创新，重点发展绿色、生态、精品、观光休闲农业，推进农业标准化、循环化生产，

品牌化、电商化销售。

目前，仙居绿色农业标准化实施达到 100%，建成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粮（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 6 万亩，有机产品、绿色食品、无公害产品认证总面积达 25.2 万亩，成为省级现代循环农业示范县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心县。

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着力点，仙居不断引进新技术，大力培育产业关联度大、精深加工能力强、规模集约水平高、辐射带动面广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提升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水平。海亮集团自引入园区后，投资 2.5 亿元，建立了从种子培育、肥料生产、种植、养殖、加工、全程冷链物流直至终端专卖店的全自营产业链，去年实现销售收入 1000 余万元。

推进循环高新，集群发展

创建特色生态工业高地

10 月 13 日，台州云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签订协议落户仙居县经济开发区。同日落户的科技型企业有 9 家，总投资 13.06 亿元。

“今年，开发区新签约项目 21 个，总投资 36.07 亿元。其中，入驻孵化器项目 12 个，总投资 13.61 亿元。”仙居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东健告诉记者，今年开发区引进的 11 家医疗器械企业，已有 1 家正式生产、3 家试生产。



自去年成功被列为全省首个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县后，仙居着力优化体制机制改革，从项目准入、政策引导、考核机制等各层面为绿色发展开辟“绿色通道”，提供“全程护航”。

围绕打造浙江省生态工业高地目标，仙居在加大绿色工业项目招商引资的同时，贯彻落实差别化工业政策，引领全县工业经济持续升级。

一方面，该县实施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制定工业绿色化标准，持续推进工业集群化发展和循环化、清洁化、高效化生产。目前，现有医药企业正在整体向工业园区搬迁，工艺礼品产业大力向文化创新和时尚家居产业升级。园区设立的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园，则引导发展高端医疗器械产业等新兴战略性产业。

另一方面，开展“强工助企优服务”活动，打好“四换三名”组合拳，推进工业领域“五化同步”，倒逼企业转型发展，向智能化、高端化、品牌化跃升。

一系列的举措，使得仙居产业结构变“轻”、发展方式变“绿”、经济质量变“优”。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2.68%，工业性投入年均增长26.73%，企业亩均税收年平均增幅达19.30%，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90%。去年，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8%，居全市第一。



▲浙江优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作为绿色项目被仙居引进后，落户仙居医疗器械产业园。目前该公司已投入生产，主要生产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可视喉镜及系列产品。

实施全域景区，农旅融合

建设国际旅游休闲胜地

张海峰是上海一名复古旅业投资商。在仙居考察一年后，他决

定投资 3000 万元在官路镇建设一个高端民宿项目“青近之汤”。

像张海峰这样的外来民宿投资商正纷至沓来，不少游子也乘势回乡投资民宿。至今，该县民宿和农家乐总数达到 900 户，床位数 10500 张，民宿投资达到 5 亿元。



依托美名远扬的神山秀水，仙居坚持“全域景区化、景区一体化”的理念，以生态、养生、休闲、文化等为主题，以 5A 神仙居景区、神仙居旅游度假区为龙头，大力实施旅游国际化和“旅游+”战略，加速旅游与文化、健康养生等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温泉旅游度假区、国际健康休养小镇等一批重点旅游项目的建设，又增添了仙居旅游内涵。

“仙居既是国家生态县，又是全省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县、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县。”县农业局负责人介绍，仙居把三者紧密结合，以生态旅游为“粘合剂”，通过产业互动融合发展，实现共促提升。

随着杨梅节、油菜花节的成功举办，荷花节、牡丹节、马鞭草节等农事节庆活动活跃于乡村沃野上，“四季花海”在仙居已成为常态。而这些农事节庆的举办，又带旺了农家乐休闲旅游蓬勃发

展。仅今年上半年，全县农家乐直接营业收入达 6112 万元，“仙居火红杨梅采摘生态游”“仙居亲子踏春二日游”两条线路成功入围全省 30 条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去年，仙居入围 2015 年中国旅游风云榜“美丽中国”旅游县（区）TOP10，入境游人次年均增幅达到 40% 以上。

（来源：台州日报 2016 年 12 月 17 日 潘春燕 陈兴多 吴鹤仪）

中国山水画城市

——美丽仙居的绿色化发展改革之路

仙居，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是一个连神仙和古代帝皇也眷恋和向往的地方。早在 1000 多年前，宋真宗就以其“洞天名山，屏蔽周卫，而多神仙之宅”，钦赐县名为仙居。

仙居，是一个“天然氧吧”，是一块难得的心灵净土。这里，生态优越，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达 77.9%。这里，山川逶迤，江河秀美，景色壮美，集“奇、险、清、幽”于一体，汇“峰、瀑、溪、林”于一地，被人们赞喻为“仙人居住的地方”。仙居先后获得了国家生态县、国家公园试点县、美丽中国“十佳旅游县”、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有机食品生产基地、长三角最佳慢生活旅游名城、中国慈孝文化之乡、浙江省十大养生福地等多项荣誉称号。

2015 年，仙居成为了浙江省首个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县。作为全省绿色化发展改革先行先试地区，仙居县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围绕生产循环化、生活低碳化、全域生态化、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发展绿色经济，狠抓绿色项目，建设绿色家园，增进绿色福祉，深化绿色改革，努力建设成为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中国山水画城市，力争率先成为浙江县域绿色经济发展示范区、绿色生活方式的践行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区、绿色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区。

发展绿色产业 实现经济绿色转型

一直以来，仙居坚持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方式创新，

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使“绿色经济”成为新常态，让美丽与发展同行。

仙居生态农业，围绕打造中国最高端农业的目标，坚持绿色、有机方向。以台湾农民创业园为平台，重点发展绿色、生态、精品、观光休闲农业，推进农业标准化、循环化生产，品牌化、电商化营销，成为国家级绿色食品加工示范基地。以仙居杨梅为例，成功创建中国驰名商标，拥有绿色食品认证、原产地保护认证、地理标志认证，热销国际市场，年销产值达 5 亿元以上。仅此一项，就为仙居县农民人均增收超千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产业和富民产业，也成为仙居的一张闪亮名片。

仙居生态工业，围绕绿色智造的目标，鼓励企业加快创新步伐和产品研发，引导医药企业向制剂药、生物医药转型，加快工艺礼品产业向文化创新和时尚家居产业升级，发展高端医疗器械产业等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工业循环化生产，成为浙江省生态工业发展试点示范县，实现了产业结构变“轻”、发展方式变“绿”、经济质量变“优”。

仙居生态旅游业，围绕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坚持“全域景区化、景区一体化”的理念，以生态、养生、休闲、文化等为主题，以 5A 神仙居景区、神仙居旅游度假区为龙头，不断发展，实现了由景区时代向目的地城市时代转变，成为长三角地区著名的旅游休闲胜地。2015 年 10 月 15 日，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最新一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神仙居景区正式成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2015 年 6 月，神仙居氧吧小镇列入全省第一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以“绿色转型”为目标，仙居“绿色发展”有了全新载体，传统旅游业开始向观光与休闲度假相融合的全新业态转型。

神仙居氧吧小镇，位于仙居中部旅游板块白塔镇境内，处于神仙居旅游度假区的核心，也是通往神仙居、景星岩、淡竹休闲谷、皤滩古镇、高迁古民居等景区的必经之地，是仙居旅游的门户和高地。小镇规划面积 3.8 平方公里，计划总投资 80 亿元，预计 3 到 5 年初步建成。

在全省首批特色小镇中，神仙居氧吧小镇“特”在哪里呢？答

案是：“绿色”。这里山、水、林、田星罗棋布，植被覆盖率高，水域面积广阔，负氧离子浓度高。据测算，平均每立方米负氧离子含量为 2 万至 3 万个，含量最高一处测得 8.8 万多个，超出仪器峰值。

隆冬时节，走进神仙居氧吧小镇，或在波光粼粼的如意湖畔信步游览，或静坐草坪远眺神仙居景区奇峰。慢生活里，感受到的是空气的清新和生活的惬意。

建设绿色家园 增进百姓绿色福祉

为给百姓提供一个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交通更畅通、生活更舒适的环境，仙居县委县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围绕建设中国山水画城市的目标，坚持以绿色理念引领城乡一体化，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建美绿色城乡，增进百姓绿色福祉。

县四套班子领导带头每两周开展一次绿色头脑风暴，部门、乡镇、街道领导和业内的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齐聚一堂，为仙居绿色化发展改革建言献策，出谋出力，使绿色决策更科学，绿色新政更接地气。

仙居坚持不求规模求特色，不比大小比精致的理念，全力打造醉美新城区，建成了一条全长 112 公里连通城乡的全省最美绿道。在绿道配套设施建设中，仙居建设部门不仅考虑绿道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相结合，彰显地方特色，还提倡低碳、绿色、环保理念。除无骨花灯形路灯外，在栈道、栏杆、驿站建设上采用石英塑等节能、环保、耐用的新材料，使之融入周围景色，错落有致。绿道的建成，不仅丰富了仙居的旅游产品，也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增收，更为市民带来了美好的生活。据统计，绿道建设开放后，为沿线村提供直接就业岗位 500 多个、间接就业岗位 1000 多个，实现农民人均增长 1000 余元。其中，沿线村集体经济增长速度比非沿线村快 53.6%。2015 年，仙居绿道被评为了中国人居范例奖。

仙居县以“粉墙黛瓦、绿树红花、小桥流水人家”为总目标，全力打造和美乡村名片。在农村开展“赤膊墙”“一户多宅”整治，推行农村“人畜分离”，使农村面貌从“黄脸婆”变成“白富美”。目前全县已经建成村级养殖集居点 76 个，发展畜禽养殖场

164 家。两年内将陆续新建乡村养殖集居点 260 个，辐射带动 1 万余户分散饲养户集中到养殖小区。此举是对千百年来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变革，也是农村治污治脏的根本举措，改变了农村臭气扑鼻来、粪便随处见、蚊蝇满天飞的生活环境，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支持。

仙居以国家公园试点县创建为抓手，开展全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探索建立区域生态环境敏感区、保护区、重要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区分区化管制，制度化管理，项目化管护的系统保护机制。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县级《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成功争取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TEEB）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仙居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新型碳汇项目等多个国际性项目。目前，国家公园内已发现各类木本植物近 1500 种，野生脊椎



动物 260 余种，并有保存较好的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位于全国前列。

深化绿色改革 探索建立绿色机制

仙居以变革的勇气、改革的决心和创新的举措，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难题，实现“富裕”

与“美丽”有机融合。

在构建绿色化发展规划体系、政策体系、指标体系、绿色产业融合、绿色城乡建设、绿色生活变革、绿色生态治理等方面，确定了30多项重大改革措施，其中13项改革举措由绿色发展倒逼产生，从项目准入、引导政策、生态治理、城市建设、考核机制等方方面面，为“绿色发展”开辟“绿色通道”。

探索建立绿色大考评机制。改革唯GDP的考核评价体系，以绿色为引领，变原先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为绿色GDP发展考核，着手编制绿色创建标准体系、绿色项目引导目录、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探索建立部门协同管理机制。目前已成立大旅委、大农业、大环保等运行机制，对永安流域的采砂进行协同管理。完善了投资项目绿色审批制度，实施旅馆业等“三业联合审批”制度，得到省领导批示肯定，在全省审改系统推广。

探索建立区域协调治理机制。构建以中心镇为核心，统筹周边乡镇发展，将全县20个乡镇街道组建成为六大协作区，实现协作区内规划编制、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党的建设等统筹发展、互补发展、联动发展、融合发展。

领略神韵的仙居，以山水脉络为依托，以生态绿色为底色，以崇德向善为风范，建筑与山水高度融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城镇乡村精致结合。美丽的仙居恰似一幅青山环城、碧水穿城、森林拥城、景城一体的山水长卷，永驻心田，长留人间。



（来源：《浙江日报》 2016 年 1 月 27 黄珍珍 徐巧玲）

“2016 美丽中国行” 聚焦神山秀水的仙居



12 月 19 日，由中国旅游报社主办，仙居县委宣传部、仙居县风景旅游管理委员会承办的“2016 美丽中国行 聚焦神山秀水的仙居”大型中央媒体采风宣传推介活动启动仪式在仙居举行。中国旅游报社社长助理吴晓梅、仙居县委副书记邵海丽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邵海丽在致辞中介绍，仙居生态环境优美，自然景观壮丽，人文历史悠久，民俗风情独特，是一处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休闲养生之地。县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58 平方公里，有国家 5A 级景区——神仙居；有“中国最美绿道”永安溪生态绿道；有浙江为数不多的优质温泉神仙湾生态温泉；有华东第一龙型古街皤滩古街；有南宋大理学家朱熹两次送子求学的桐江书院；有华东最后的香格里拉仙居公盂景区；还有淡竹休闲谷、景星岩景区、永安溪漂流等。

近年来，仙居先后被评为国家生态县、中国长寿之乡、浙江省十大养生福地之一、“美丽中国”十佳旅游县、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最佳乡村旅游

度假目的地、全国首批国家公园试点等。优良的生态，已成为仙居走向国际舞台的“金名片”。



中国旅游报社社长助理吴晓梅表示，中国旅游报社组织的“美丽中国行”大型系列采风活动是贯彻国家和行业发展战略的一项探索尝试。自 2013 年起，中国旅游报社组织全国一线记者、知名作家、名博主、旅游达人等千余人次参与，足迹遍及 20 多个省区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展了 50 批次采风活动。足迹踏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汇集采风成果的《美丽中国行》系列图书出版近 30 种。通过现场实地采访、全媒体方式、多角度地宣传报道了“美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得到了各地旅游部门和旅游企业的高度认可，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浙江是“美丽中国行”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县域旅游是中国旅游报报道最多的领域。仙居作为县域旅游的代表，目前正以建设精品景区、美丽乡村为重点，以文化与旅游融合为突破，抢抓机遇，形成“精品带动、多点支撑、产业融合、行业跟进”的全域旅游格局。作为国家旅游局主管的覆盖全行业的唯一纸媒、全国“百强报刊”、“行业报 50 强”，《中国旅游报》将持续关注仙居旅游发展成果，为仙居旅游的实践探索鼓与呼。

（来源：中国网 2016 年 12 月 19 日 颜国良 有删减）

仙居绿色乡村建设标准化试点跻身国家级 浙江仅仙居入选

第二批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项目

编号	项目	地区	项目申报单位
1	美丽乡村标准化试点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人民政府
2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人民政府
3		河北	内丘县人民政府
4		河北	吴桥县桑园镇人民政府
5		河北	衡水滨湖新区管理委员会
6		河北	南和县人民政府
7		山西	孝义市人民政府
8		山西	阳泉市郊区人民政府
9		内蒙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政府
10		辽宁	盘锦市大洼区人民政府
11		吉林	和龙市人民政府
12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人民政府
13		浙江	仙居县人民政府
14		安徽	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政府
15		安徽	南陵县人民政府
16		江西	靖安县人民政府
17		江西	会昌县人民政府
18		江西	金溪县人民政府
19		山东	费县人民政府
20		山东	曲阜市人民政府
21		山东	青州市人民政府
22		山东	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人民政府
23		湖南	浏阳市人民政府
24		湖南	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政府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下达了《第二批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项目的通知》，仙居县政府申报的以“绿色乡村建设标准化”为核心的试点项目榜上有名，成为全国 33 个试点县（市、区）之一，浙江仅仙居入选。

近年来，仙居率先在全国建成农业“三位一体”公共服务体系，形成鲜明的产业特色和优势，仙居杨梅、仙居三黄鸡、山茶油、有机茶等农产品享誉省内外，并获得“中国杨梅之乡”“中国有机茶之乡”“全国经济林产业示范县”等称号。目前，该县共有国家级标准化项目 4 个、省级项目 14 个、市级项目 13 个、县级项目 14 个，绿色化发展已经成为当地的共识。

根据试点有关方案，未来几年，仙居将结合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工作，引入先进的标准化管理理念，发展乡村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改善农村环境，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将“绿色乡村”建设的经验、成果进行标准转化。编制具有仙居特色的“绿色村居”地方标准，加以推广实施，持续改进，探索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实现乡村人居环境和自然生态、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社会保障和乡村服务以及农民素质和精神文明的全面提升。到 2019 年，全县大多数乡镇（街道）达到“绿色乡村”建设工作要求，实现“村新、业兴、景美、人和”目标，为中国建设美丽乡村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来源：台州日报 2016 年 12 月 11 日 叶晨阳）

相关学术研究

绿色发展理念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思考

前言

众所周知，生态破坏严重、灾难频发、生态压力巨大等突出问题，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与蜕变致使人类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威胁。“环境问题在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当前，我国资源环境承载力已逼近极限，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绿色发展将引导中国发展思维的根本转变，促使经济增长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绿色发展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加强公民生态教育，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培育公民良好生态修养，切实提高公民生态素质，全面启动绿色发展模

式，是建成美丽中国的客观要求与必然选择。

当前建设美丽中国面临的主要困境与现实挑战

两千多年前古代思想家庄子在《齐物论》中就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核心是倡导人与大自然和平共处。美丽中国建设同样涵盖了“天空更蓝、水源更洁、环境更美”的“天人合一”思想。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公民生态修养低的现实，建成美丽中国仍面临着以下困境与挑战：

（一）我国经济粗放式发展，造成资源环境生态严重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粗放式发展，导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盲目增加资本、资源的投入来实现，发展消耗成本较高，经济社会效益较低。此种发展模式在带来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水土流失、污染横行、雾霾肆虐、生态失衡等问题不断突显，人类与大自然的冲突在不断升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早在 1995 年 9 月，党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就明确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强调依靠推动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来增加产品数量与提高产品质量，推动经济快速稳步增长。然而，目前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日趋严重。同时，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低，人均资源占有量严重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质量的改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前进步伐。

（二）生态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美丽中国建设缺乏制度保障

我国生态法制化建设相对滞后，环境保护缺乏制度保障，这影响了美丽中国建设的进程。只有通过加强生态立法为我国的生态教育、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律制度保障，从源头上改变相关法律法规碎片化、等级低的状况，才能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坚强的支撑和制度保障。在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发展进程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2014 年 4 月 24 日，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 年 9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上这些法规、制度等的实施必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三）生态教育发展相对落后，我国公民生态意识淡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75 年正式制订了国际环境教育计划，创办了环境教育刊物《连接》，收集了世界高校及科研院所 900 多个生态教育机构 300 多万条生态教育信息。198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环境教育培训大会，讨论并制订了国际生态教育培训计划，全面阐述了生态教育的内涵、途径及意义。生态教育理论研究源于西方，国外理论研究对我国生态教育理论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 世纪 70 年代，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办了生态学专业，开始注重生态教育专业人才培养。1998 年清华大学启动“绿色大学示范工程”，把生态教育列为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我国现行教育制度存在的功利性导向造成对生态教育重视不够，加上我国生态教育起步晚，发展慢，生态教育漠视，导致我国公民生态意识普遍淡薄，生态行为严重缺失，广大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激情与能力整体欠缺。

（四）公民生态修养普遍较低，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热情不高

绿色梦想，不仅仅是国家的、政府的，更是每个公民的。公民生态修养是指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公民生态意识、生态理念、生态品格、生态道德以及环保技能和生态行为的综合表现，它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公民的生态素养状况与水平，直接体现着一个国家生态文明的发展进程和态势。公民生态修养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基础和关键要素，也是公民绿色发展观状况和水平的真实体现，良好的公民生态修养在整个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中能否产生深刻、持续的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的进程。我国公民生态修养普遍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从而增强公民生态意识，规范公民生态行为。美丽中国建设不仅需要绿色发展的坚强理念，更需要践行低碳生活坚定的行动，建设美丽中

国任重道远，需要全体公民的高度参与，每一个有担当的公民都应该为保护生态环境而不懈努力。

绿色发展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思考

追求绿色时尚、崇尚绿色文明，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又一主旋律，政府必须转变发展思路，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启动绿色发展模式，推进生态法制化建设，构建现代公民生态教育框架，从而推进天蓝地绿水净美好家园的建设。

（一）转变发展思路，全面启动绿色发展模式

2015 年 9 月 25 日，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人类绿色生态发展历史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绿色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它将人类福祉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打破并扩展了人类财富、福祉、增长与发展质量的传统定义，将人类福祉置于发展的核心地位。

1、推动社会绿色发展思路转变

我国生态文化氛围淡薄，美国生态专家唐纳德·沃斯特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观念、行为的转变是前提，绿色发展理念是公民生态意识、生态行为的基础，公民绿色发展观决定着公民生态素养的高低。绿色理念，贵在践行，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国正在从生态文明建设被动的参与者转变为积极的建设者。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质量在公民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要加强公民生态教育，通过开展“创建绿色家园，让绿色风行天下”等活动，实现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2、全面启动绿色发展模式转变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

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全社会形成节约、环保的绿色生活氛围。要全面启动并大力推进绿色发展模式，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促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动力加快转型、经济增长模式尽快转变，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全面推进我国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发展转变到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发展轨道上来，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发展。

（二）促进生态立法，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美、英、法等发达经济体都十分重视生态教育，并颁布了与生态文明建设、环境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要借鉴发达经济体的有益经验，加强生态法治建设，为推动我国生态教育、绿色发展、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

1、积极推进绿色发展法制化建设

制度建设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与长期性。“建立法律法规体系，充分发挥环境和资源立法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约束作用。”绿色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资源环境绩效，本质在于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唯有积极推进绿色发展法制化建设，才能更加有利于绿色发展在全国范围的强力有序推进，为促进绿色发展与建成美丽中国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2、健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

要通过健全和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严格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制度。明确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建立政府生态责任机制，严肃生态监管，实行生态问责”。要不断完善我国生态法制化建设，健全生态教育与生态惩戒体制，为推进绿色发展、公民生态教育、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从而把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逐步变为现实，让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共享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三）加强生态教育，全面增强我国公民的生态意识

公民生态教育是全面提高公民生态素养的教育实践活动。世界

生态教育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范围的生态觉醒。“人的心理和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置身于生态系统之中，与自然、社会发生着广泛的联系”。意识是行为的先导，要通过加强生态教育全面提高公民的生态意识，实现人的充分发展与生态系统改善的和谐统一。一方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生态教育模式。建设美丽中国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诉求、共同的利益所在，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并付诸行动。生态教育作为一种跨学科教育，其内容涵盖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环境科学等诸多学科。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要注重加强生态教育，在学习借鉴国外公民生态教育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教育模式，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增强公民生态意识，培育公民生态理念，健全公民生态教育体制机制等，教育引导全体公民树立绿色发展观，恪守生态文明红线，使全社会形成节约、环保的绿色生活氛围，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另一方面，科学制订系列公民生态教育教材。公民生态教育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全国性、全民化特点，它覆盖面广，教育内容丰富，教育周期长，是一项面向全体公民的终身教育。由于生态教育对象在年龄、职业、学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他们对教育方式、生态教材的要求多层次、多样化，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编写、审定、出版发行系列生态教材，针对不同社会群体开展多样化的生态教育，以促进我国生态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

（四）注重生态，全方位培育公民良好生态修养

公民生态修养培育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与内在动力，公民生态修养状况和水平直接决定着建成“美丽中国”的进程。毋庸置疑，要从根本上实现公民从传统被动的生态保护到积极的生态支持与生态自觉，离不开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1、家庭生态教育是公民生态修养培育的第一课堂

生态教育和良好生态行为的养成必须从娃娃抓起，家庭是个人生态意识、绿色发展观形成的微环境，父母不但要注重对孩子生态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孩子生态行为的养成，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态品格，为培育公民良好的生态修养奠定基础。

2、学校生态教育是公民生态修养培育的主阵地

“学校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教育的机构，是师生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场所，是以凝聚师生为主体的生态单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打破传统教育的藩篱，还原生态教育的本真，将生态教育置于公共教育的优先战略地位，推进生态教育改革，使生态教育走出生态学专业的禁锢，把生态教育、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学校生态教育全过程，特别突出生态实践教学在生态教育中的关键作用，坚持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使公民养成良好的生态修养筑牢基础。

社会生态教育是公民生态修养培育的重要场所

社会是开展公民生态教育、培养公民绿色发展观的大课堂，有学者指出，“社会是公民教育的大课堂，是生态道德教育的核心场所”。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借助新媒体传播生态知识和生态理念，在全社会宣传和普及生态知识，弘扬生态文化，传播绿色理念，践行低碳生活，形成绿色创新思维、法治思维，教育引导全体公民形成绿色价值取向、绿色思维方式、绿色生活方式，使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并外化为自觉行动。坚持从我做起，培育公民以生态意识为基础，以生态情感为驱动，以生态信念为支撑的生态人格，养成良好的生态行为与生态习惯，全面培育公民良好生态修养，共同筑造中国梦的绿色底蕴，共同唱响美丽中国的绿色颂歌。总之，要坚持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不断增强公民生态意识，提高公民生态品格，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公民生态教育理论范式，创新培育公民生态素养的生态教育实践模式，全面提高我国公民的生态素养，确保全体公民共享绿色生活，从根本上将绿色发展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全民行动中凝聚起最广泛的生态共识，汇集为最强大的生态合力，为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把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逐步变为现实。

（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6月第24卷第6期 蒋笃君）

绿色治理：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

导言

20 世纪以来，人类的物质生活迅速发展，但这一发展却背负着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森林和草地缩减、生物多样性减少、大气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凸显，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从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晋升为世界性的重要政治议题，以至于很多国家开始把生态环境问题视为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的课题。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接踵而来。面对严峻的挑战，党的十五大（1997 年）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六届五中全会（2005 年）进一步要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十七届五中全会（2010 年）明确号召“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并将“绿色发展”写入“十二五”规划并独立成篇；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 年）更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可见，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绿色”是生态环境特有的颜色，有无公害、健康的意思，代表生命、节能、环保。与绿色有关的活动不仅有益于人的健康生活与发展，如绿色消费、绿色标志、绿色食品等；也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如绿色贸易、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等。因此，建设“美丽中国”必然要建设“绿色中国”，建设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中国。同样，中国的管理和治理也必然是绿色管理和绿色治理。本文回顾了绿色生态环境治理的发展历程和范式变迁，探讨了绿色协同治理的体系构建，讨论了我国在绿色协同治理体系构建方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绿色治理的发展历程和范式变迁

绿色生态环境治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和范式变迁。最先在思想意识层面，出现了“绿色政治”思潮，并产生了许多“绿色政党”；

接着，各国政府机构开始致力于生态环境问题管理，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并提出要发展“绿色行政”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绿色政府”；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客观上要求社会各组成部分共同参与其中，因此推进“绿色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绿色社会”，用社会共同的力量应对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必然选择。

1、绿色政治：吹向全球的绿色“旋风”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的物质主义支配下的经济发展模式给全球生态和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此时，“一个充满活力的环境运动在北方和南方世界组织起来，并在公民社会和更规范化的议会政治舞台上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力量。”这就是绿色政治思潮，它在欧洲兴起并向全球扩展。该思潮聚焦于生态和环境问题，以维护生态平衡和反对环境污染为起点，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为最终目标。它将绿色思想视为更高层的世界观（而不只是单纯的社会思想），认为生态主义是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处于同一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

绿色政治以“政治生态主义”为基础，并倡导“生物圈平等主义”。（1）它主张“一种认识，即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处在它之上，人类所有的商业活动以其生命本身，最终都依赖于人类与生物圈充满尊重的相互作用”。（2）要求政治制度的设计应该源于对自然的启迪：自然世界具有多样性、相互依赖性、永续性和作为“女性的自然”等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应该被应用于政治制度的设计，如宽容和民主、平等、传统、女权主义等，并建立一个“多样化意见得到尊重且受到称道的‘健康的社会’”。（3）绿色政治认为消费是污染的根源，实现可持续社会必须减少个体的物质消费；技术的进步不仅不能满足人类无限的需求，也不会像环境主义所说的“可以解决一切产生的生态和环境难题”，它仅仅是对问题的转移，却以更多的“能源和物质投入因而出现更多的污染”为代价。

（4）绿色政治反对环境主义主张的“在不需要根本改变目前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解决问题”，认为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才具有持续性，而且这一可持续发展必须深刻改变人类与自然的现阶段关系和人类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模式。这样，绿色政

治突破了在具体体制内寻求解决方法的局限，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如图 1），当然这也暗示了它不能提出具体有效的治理措施，在短时间内难见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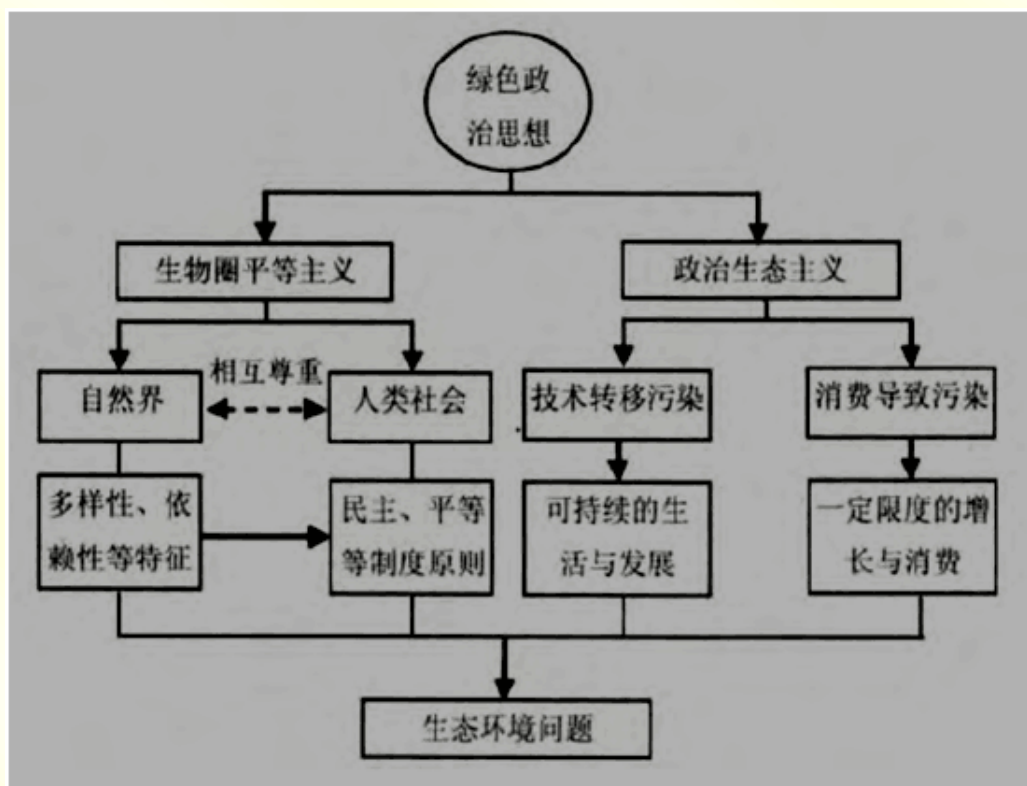


图 1 绿色政治

全球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是导致世界各国绿色政治兴起的最重要原因。现今全球已有超过 70 个绿党组织致力于生态政治思想的传播，如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团结组织（United Tasmania Group）、新西兰的价值党（Values Party）、英国的生态党（Ecology Party）、德国绿党、加拿大的小党（Small Party）、芬兰的绿色联盟（Green League）、中国台湾的绿党等，且这一数量还在不断增长。在中国大陆，生态环境问题已被提上议程，尽管绿色政治在国内还不为大多数人所关注，但是我们所倡导的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与绿色政治思想所倡导的内容有内在的一致性，即寻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发展。

2、绿色行政：绿色思想的“着陆”

面对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各阶层、各组织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之在一些“绿党”的推动下，政府等相关机构也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并开始采取措施。然而，公众、企业及其

他社会组织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倡导绿色价值的“绿党”也只是临渊羡鱼。所以，在“绿色化”已经成为当前环境、社会和经济主题的背景下，政府理应做出应对和创新，绿色行政便应运而生。

1993 年，“绿色行政”（Green Administration）首次由莱西哈特提出，用于概括克林顿——戈尔执政时期的环境管理。之后，许多数学者对“绿色行政”做了不同的定义，但基本认为绿色行政是环境友好型的行政，是节约成本的行政，它以绿色管理思想为指导，以实现人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倡导爱护生态、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绿色行政与传统政府对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理念和途径不同。

（1）传统政府环境治理时更看重治理的结果，而忽视治理过程中的成本控制；绿色行政强调政府自身在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时必须做到节约成本、控制消费、提高效率等。（2）绿色行政视生态环境管理为政府的管理战略，而不是其众多职能之一，强调制定全局的、长远的目标、任务和政策的重要性。（3）传统政府专注政府对生态问题的管理，而轻社会参与；绿色行政虽然仍以政府为主导，但它更注重非政府主体（如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公众和专家学者等）的参与，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宗族组织、志愿性组织、第三部门组织以及国际性组织等。可以看出，绿色行政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并通过社会相互协作来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参与式、战略化的环境管理方式。就政府而言，可以从其他主体获得资源，节约自身的成本，促使公共部门形成绿色的竞争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实的治理措施，促进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所以绿色行政是将爱护生态、保护环境从意识层面推向操作层面，真正去保护自然、治理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了绿色思想的“着陆”。

绿色政治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争论，主要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很少提出具体的措施和手段。而绿色行政是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目标，用具体的措施来治理生态环境问题。如 1998 年美国颁布“通过废弃物的防止、循环利用和联邦采购绿化政府”，要求政府把环境管理融入日

常工作和决策中。澳大利亚政府强调绿色采购，积极和供应商合作，通过建立自己的环境管理体系来规范自身的环境行为，从而做到节约成本，保护环境。在我国，1999 年福州马尾区人民政府把建设“绿色政府”作为加快持续发展的战略。随之，深圳、梅州等地也提出建立绿色政府的计划。然而，由于我国目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理念还未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仍是政府的主要绩效指标，绿色政府还未真正形成。

3、绿色治理：新范式的出现

绿色政治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提倡“生物圈平等主义”，

并“创造一种价值等级结构以便应对物种间的利益冲突”。同样，绿色治理对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国家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反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绝对统治地位。詹姆斯·罗西瑙指出：

“治理是各种的个体和团体、公共的或者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它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规则体系，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它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治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和消费品，治理它就是处理“公共事务”。从这一意义上讲，绿色治理是指各社会主体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然而，实践表明，对于这一特殊公共产品，单一的政府和市场的供给与治理都存在“失灵”，所以我们需要倡导一种更为多元化主体的治理模式。

绿色治理和绿色政治、绿色行政一样，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中心。但绿色治理在具体的治理理念和方式等方面异于前者。（1）绿色治理的主体除了政府以外，还包括其他各种公共组织、私人组织、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企业、行业协会、科研学术团体和社会个人等，只要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献计献策的组织或个人，均可参与其中，而且他们之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2）绿色治理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生态环境问题，只要是与生态环境问题有关的社会问题 and 经济问题等，均是绿色治理的对象。（3）绿色治理方式弱化国家的常规方法，不同于绿色行政以政府为中心的参与式管理，

它强调各种主体在自愿、平等基础上通过合作与协调，构成一个绿色的复合型主体，形成一个绿色的社会系统（如图 2），最大限度地维护生态安全，保护环境，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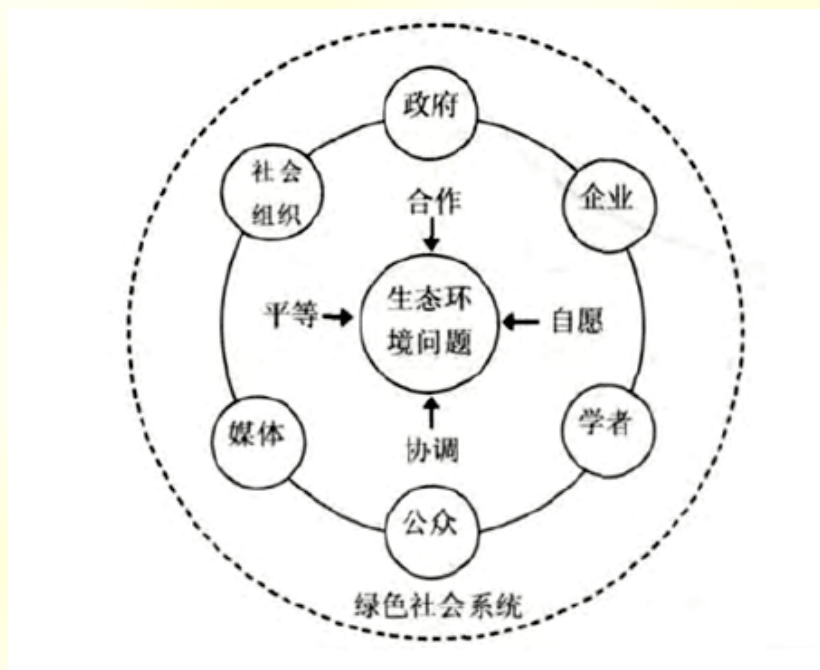


图 2 绿色治理

从实践方面来看，为协调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发达国家积极鼓励循环经济，倡导循环社会。这一措施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同样需要社会各组织和个人的积极献策、共同出力，共同建立生态环境友好型社会。如德国形成一套“网络互动、上下结合”的生态管理体系，各主体通过“环境与发展论坛”相互联系起来，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加拿大联邦政府在生态管理行动中不设立专门的权威机构，而是采取“政府支持、社会治理”的模式来实施生态治理，更加强调社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从我国目前形势来看，政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多元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机制尚未形成。这直接造成治理效果大打折扣，治理成本不断增加。

绿色协同治理体系构建

绿色治理的各主体构成一个系统，每个主体都是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只从形式上说每一个主体都参与到了治理体系，应更加强调主体之间的实际协同关系和职责。如何让这些治理主体实现有效协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同共治，这就需要构建有效的绿色协同

治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媒体、专家学者等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协同合作，将绿色行政、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参与、绿色宣传和绿色智慧有效结合，形成完整的绿色协同治理体系，促成绿色生态社会，从而产生绿色治理合力，最终促进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

1、政府：绿色行政

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政府很难完全掌握解决多样化、综合性、动态的问题所需的知识和信息，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与能力去应用所有的工具。因此，在治理复杂的公共问题的过程中，政府应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保证每个参与主体各尽其责，发挥各自优势，做到优势互补，节省治理成本。具体而言，实现绿色行政，不仅需要相关部门积极推动社会广泛参与机制的建设，鼓励各主体参与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形成切实可行的环保法规，而且需要行政人员提高自己的环境意识和政策水平，以绿色方针、绿色计划、绿色政策和绿色管理为理念，促进建立一个利于社会、经济、生态和谐发展的决策机制和运行机制等。总之，政府等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实施政策时都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本出发点，不仅要做到绿色行政，更要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绿色宣传、绿色参与、绿色消费和绿色智慧。

2、企业：绿色生产

工业污染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也是造成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因此，企业参与环境治理是理所应当的。面对生态环境问题，企业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非绿色”道路，而应该主动进行绿色生产，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使污染物的产生量最小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企业进行绿色生产，主动出资、出力，积极响应国家绿色政策，就是一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的表现。企业除了要做到绿色生产，在管理上也做到绿色管理，并积极对自己的绿色理念进行宣传，鼓励公众绿色消费，使企业自身拥有绿色的智慧，形成企业特有的绿色文化。此外，政府、社会组织、媒体等应加强对企业监管，并积极宣传环境保护意识，奖励“绿色”企业，批评教育“非绿色”企业，使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促使企业开展绿色生产，最终从源头上防止生态破坏，保护环境。

3、媒体：绿色宣传

在网络社会环境下，互联网成为新的传播媒介，信息传播媒介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覆盖率高、信息量大、影响面广、冲击力强等特点。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大众传媒在绿色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构建中的作用越发凸显，绿色新闻已成为目前新闻报道以及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媒体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的主要中介，在环境治理与保护方面的主要作用仍然是环境保护教育，并提供生态环境信息。通过积极宣传绿色思想，倡导积极的绿色活动，让社会传播生态环境保护的正能量。从宣传的内容来看，可以涉及包括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等与生态环境问题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可以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或有利于生态平衡发展的积极事件，也可批评教育破坏生态环境的负面行为。当然，在宣传过程中除了要注重和其他主体的合作，还要注意把绿色宣传的内容大众化，使绿色意识形态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给绿色理念赋予鲜明的实践色彩和生活气息。

4、社会组织：绿色参与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介于政府部门与营利性部门之间的社会性公共部门，具有相对的自主性、独立性和社会吸纳性，能够更好地代表社会各利益阶层。他们在提高公民环保意识、提倡绿色生活、减少生态破坏、防止环境污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可以通过与政府建立委托关系、凭借其在生态环境领域的专长，为政府决策做前期调研或出谋划策，与政府共同履行绿色行政的职责；也可独立自主地进行生态和环境治理。它们也可作为其他参与主体之间的桥梁，促进信息的沟通，推动各主体之间的合作。一些国际性组织也可成为国家和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促使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国际合作。同样，社会组织也可以与企业建立关系，推动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如对企业生产活动进行监督或与企业合作。此外，社会组织也可作为公民的代言人，代表其参与环境治理，也可以凭借自己在社会中较强公信力进行绿色理念的宣传与教育。

5、社会公众：绿色消费

绿色政治强调消费必然产生污染，而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等消费主义的行为使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因此，我们要倡导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是注重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的理性行为，它能够对生产厂商形成直接压力，迫使其改进技术，提高商品的生态性。所以，大力倡导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对于缓解生态和环境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推行绿色消费，需要建立一个绿色消费的社会氛围，必须提高消费者的绿色意识，让消费者拥有绿色消费的认知。政府应积极鼓励相关的绿色消费活动；媒体主动利用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载体进行绿色消费的宣传与教育；社区可以经常开展绿色消费的活动，促进绿色消费观深入人心；公民除了自己养成绿色消费的习惯外，还需要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通过投票、谈判协商、参与听证会和民意调查、关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使公民以其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为生态环境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从而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效能。

6、学者：绿色智慧

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污染与治理的问题，其涉及的范围广泛，没有专业的知识和有效的信息很难很好地解决问题。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在生态环境等方面所拥有的知识都相对比较匮乏，知识水平还是很难达到解决问题的要求。于是，一些在知识和信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人开始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即“学者型治理”或“专家学者参与型治理”。这些专家学者以自己的知识和信息优势，作为政府机构的智囊团成员，提出政策建议；为企业做战略咨询，促进企业形成绿色生产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作为知识和信息“权威”拥有者，在教育公众进行绿色消费、参与环境治理等方面又具有独特的优势；也可以通过媒体或者和媒体进行合作，向社会宣传绿色理念和绿色思想。

（来源：《中国行政管理》 2014 年第 11 期 杨立华 刘宏福）

走绿色发展之路，建设美丽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地位，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我们要坚定地走绿色发

展之路，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一、生态文明的突出地位——“五位一体”

进入新世纪以来，“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概念纷纷提出并付诸实践。2002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发表《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选择》，提出中国应选择绿色发展之路。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许多国家把发展绿色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突出绿色的理念和内涵。

实际上，“绿色发展”理念已较早进入中国共产党的视野——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等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并将到2020年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要求之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绿色建筑、绿色施工、绿色经济、绿色矿业、绿色消费模式、绿色采购不断得到推广。“绿色发展”被明确写入“十二五”规划并独立成篇。这表明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专门的一部分全面加以论述，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并首次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理念的重要升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布局顶层设计的科学完善。对中国以及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美丽中国”

党的十八大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特别强调的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在发展的同时留给子孙后代天蓝、地绿、水净的家园。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这种文明形态以尊重和保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内涵，致力引导人们走持续、和谐发展的道路。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也是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飞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良好生态环境、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

我们不仅要强大富裕的中国，也要建设美丽的中国；不仅要增加 GDP，也要提高生活质量，拥有健康，要有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茂密的森林、广袤的草原。从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虽然我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量低，加上过去长期实行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使资源、能源消耗很快，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必要的资源、能源和良好的环境条件，那么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会失去基础，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文明受到威胁。加之由于受传统固有发展理念所束缚，受扭曲的政绩观所影响，建设生态文明的政策措施并没有被完全贯彻执行。在一些地方的发展中，一些项目、公司、工程的引入，的确增长了 GDP，增加了财政收入，干部有了政绩面子，但却破坏了环境，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空气和水源，让群众付出了健康的代价。说到底，人民不仅要富裕健康的生活、稳定富强的中国，还要美丽的家园、美丽的中国。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绿色发展

“美丽中国”目标如何实现？具体说就是“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建设海洋强国”，“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一）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现实中不珍惜国土，乱

占耕地、过分放牧、乱砍滥伐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地区甚至打着开发的名义侵占农民土地。如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这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任务。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从源头上抓起，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入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般指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由消耗型增长方式向效率型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或从“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数量增长方式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物质要素的投入来增加产品数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质量型增长方式或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物质要素质量改进和优化配置来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前者片面追求数量、产值和速度，致使经济增长质量低，效益差和结构失衡；后者则改变这些弊端，注重经济增长中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协调。

（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快水利建设，增强城乡防洪抗旱排涝能力。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气象、地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

（四）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

报告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是党中央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作出的重大决策。在陆地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我国经济对海洋资源、空间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对促进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五）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十八大报告重点强调了四个方面制度建设：一要改革干部考评制度，坚决摒弃以 GDP 论英雄的考核标准，代之以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评标准。二要完善资源环境经济政策，健全并严格执行资源环境法律法规。“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三要运用市场手段，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通过制度的建立促进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化，避免排污者将污染成本转嫁给社会。四要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严格追究污染者责任是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这一难题的关键。为此，应该建立环境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让污染者为其违法行为付出高昂代价。

（来源：《现代经济信息》 2013 年第 23 期 逮原）

从“美丽乡村”到“美丽中国”

——解析“美丽乡村”的生态意蕴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引入“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是凝聚了生活美、社会美、环境美、时代美、百姓美的生态和谐之美，而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在农村的体现和实施就是美丽乡村建设，这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最终归宿。“美丽乡村”建设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蕴，是以生态现代化全新建构出的一条现代化与环境友好、协调、和谐之路，能够全面摆脱现代性束缚、超越现代化陷阱；这是自 20 世纪以来中国在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大发展的同时，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大现实问

题。

从生态文明到“美丽乡村”：乡村建设的生态变迁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焦点是关注乡村、关注农民，早在半个多世纪前，著名学者梁漱溟就预见“今后数几十年能令中国人向上兴奋的新方向就是乡村建设运动”，乡村状况的好坏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从事其他建设的根本前提。面对当前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对我国这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说，生态文明建设尤为紧迫，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在农村，农村生态文明形势严峻已成为制约美丽乡村建设的瓶颈，因此必须实现乡村建设的生态变迁。

（一）生态文明和农村生态文明的内涵诠释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很多，从生态文明的存在方式来看，主要是作为广义的文明形态和狭义的文明要素而存在。从广义来看，生态文明主要是指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之后，在对自身发展与自然关系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的新型文明形态；从狭义来看，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后的第四种文明。笔者比较认同廖福霖教授的观点：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遵循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运行的客观规律，使之和谐协调、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一种社会文明形态，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以及狭义上的生态文明。从生态文明自身系统内部来看，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综合的文明形态中，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以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良性运行和谐发展为目标，是系统性与和谐性的有机统一；从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来看，生态文明是其他文明的基础，已经并会继续渗透到其他文明建设的过程之中，生态文明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到其他文明要素的实现程度。

从区域角度可以将生态文明划分为城镇生态文明和农村生态文明。农村生态在我国整个生态系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建设农村生态文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农村中的具体体现，也是防止整个生态系统恶化的关键所在，是作为农业大

国的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选择。以生态文明的内涵为依托，农村生态文明是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即在创造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有机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文明农村。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过程，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而最突出的特点是系统性、全面性和基础性。系统性是指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包括思想生态化、生活生态化、生产生态化和环境生态化在内的系统工程；全面性是指农村生态文明不仅仅包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还要处理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要全面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基础性是指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的基础，离开生态文明或以生态文明为代价的农村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并继续渗透到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方方面面。

（二）从农村生态文明到“美丽乡村”的历史嬗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并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20 字目标和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充分体现了在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农村经济建设、农村政治建设、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社会建设和农村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有机结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2008 年，浙江省安吉县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正式提出“中国美丽乡村”计划，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引入“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因此，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重大举措，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美丽中国”在农村的实施和体现。党提出的这些理论为我们确立了农村建设的新目标，表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要贯穿和渗透于其他建设的始终，是“美丽乡

村建设”的应有之义。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建设美丽乡村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美丽乡村建设必须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为推动点，只有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下，解决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重点发展生态经济、生态科技和生态文化，大力倡导绿色消费、环保生活方式，提倡低碳生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态化，实现美丽乡村的发展目标；美丽乡村建设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归宿，是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在农村的体现和实施，体现了深刻的生态内涵。从内容上来看，二者都体现了全方面的系统性。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渗透到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而美丽乡村建设则着眼于整体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要完整体现“20字方针”，是综合考虑农村产业发展、社区建设、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在内的系统工程。从发展秩序来看，二者都是要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协调，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改变传统的GDP之上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转到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要注意协调好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布局规划、村庄建设规划等之间的关系，要统筹安排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实现乡村自然美基础上的现代美、个性美和整体美。

从“安吉模式”到“五美乡村”：“美丽乡村”的生态内涵

美丽乡村建设最早源于浙江湖州安吉，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安吉模式”是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前提，以打造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城乡和谐发展的“中国美丽乡村”为目标的。美丽乡村建设应当从各自的传统历史、人文积淀、资源禀赋、地形地貌等特色出发，构建人与自然、物质与文化、生产与生活、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农村环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更涉及历史、文化、民俗、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

（一）解析“安吉模式”的生态价值

建设“美丽乡村”始于“安吉模式”，安吉县依靠山清水秀的优势地理环境发展特色农业，走出了“生态经济强县”之路，构建了四大生态文明体系，获得首个国家级“生态县”称号。

第一，生态文明意识体系的构建实现了思想生态化。思想生态化是实现“安吉模式”的基础，只有从思想上实现从人主导自然、人对自然的控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建立现代生态文明体系。安吉县充分认识到自身独特的地方历史人文资源所具备的生态价值，在对其进行个性化生态定位之后，一方面通过各种社会活动营造良好生态建设氛围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全民生态文明意识；另一方面分层次、分级别开展不同规模和领域的生态研讨和培训，使生态思想深入到农民群众第一线。

第二，生态行为文明体系的构建实现了行为生态化。行为生态化是构建“安吉模式”的实施路径。安吉不仅在思想上重视生态建设，而且在实际发展中在创新发展生态农业、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加速发展生态旅游的基础上，建立了农、工、商一体的现代化生态生产体系，从而实现了以生态文明为主线的农、工、商一条龙的发展模式，以特色工程、示范项目为亮点，树立样板、展示品位，向世界展示了“安吉模式”的生态品牌，为中国的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样板。

第三，生态环境与人居文明体系的构建实现了环境生态化。环境生态化是构建“安吉模式”的重要支撑。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雅的人居文明体系是在生产高度发展基础上人民生活的现实改善，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实要求。一方面通过以村庄环境整治为基础、以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为重点、以山区新型城市化样板区为定位建设生态人居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实施“生态文明榜样、生态文明家庭和生态文明新风”三大行动，引导民众日常生态行为养成，从而促使民众以生态的方式来生活。

第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实现了制度生态化。制度生态化是构建“安吉模式”的重要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生态文明体系的构建，首先要有制度上的保证，而“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是环境文明制度建设的基本

原则。安吉通过建立并完善资源保护管理制度对生态文明体系的构建进行监督和管理；通过建立、健全生态恢复与补偿制度，对已经出现问题的生态地段进行恢复和补偿；通过完善生态道德规范和社会参与机制，使广大民众在增强自身生态文化素质的同时积极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体系中去。

（二）阐释“五美乡村”的生态内涵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其内涵在于时代之美、社会之美、生活之美、百姓之美、环境之美的生态和谐之美，而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在农村的体现和实施，笔者认为美丽乡村的“美丽”体现在自然层面、社会层面和人文层面三个层面，是生态良好、环境优美、布局合理、设施完善和产业发展、农民富裕、特色鲜明、社会和谐有机统一。具体包括五个层面的“美”：生态环境美、社会环境美、人文环境美、合理布局规划美和体制机制完善美。

第一，生态环境美，即围绕“美在环境”，通过生态治理促进村容整洁环境美，并通过深入推进农村环境政治，彰显生态吸引力来达到自然环境的生态变迁；所谓自然环境的生态变迁，是要处理好乡村建设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突破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危机瓶颈，实现乡村建设的自然美。自然环境的生态变迁是其他生态变迁实现的基础。第二，社会环境美，即围绕“美在生活”，通过大力推进农村生态经济发展促进创业增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来达到经济环境的生态变迁；所谓经济环境的生态变迁，是要转变农村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运用现代科技方式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乡村建设的现代美。经济环境的生态变迁是其他生态变迁实现的前提。第三，人文环境美，即围绕“美在文化”，通过提高农民的生态文化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来积极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来达到人文环境的生态变迁；所谓人文环境的生态变迁，是通过处理好乡村建设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农民的生态文化素质，塑造低碳型生活方式，从而实现乡村建设的人文价值。人文环境生态变迁是其他生态变迁的最终归宿。第四，合理布局规划美，即围绕“美在布局”，通过生态规划改变乡村分散杂乱的现状，并通过加快各类规划编制实施来提高规划执行力实现乡村总体布局环境的生态变迁；所谓

乡村总体布局环境的生态变迁，是指在提高规划执行力的同时实现乡村建设的整体美。乡村总体布局环境的生态变迁是其他生态变迁实现的整体要求。第五，体制机制健全美，即围绕“美在建设”，通过健全乡村建设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农村生态环境监控体系和社会保障机制，从而实现乡村保障机制的生态变迁；所谓乡村机制体制的生态变迁是指通过建立配套的监管机制和保障机制，增强乡村服务机制的服务意识，强化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从而实现乡村建设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乡村机制体制的生态变迁是其他生态变迁实现的制度保障。

从“美丽乡村”到“美丽中国”：“美丽乡村”的生态意蕴

从“安吉模式”的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建设“美丽中国”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规律认识更加全面深刻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又达到了新的认识高度，是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生态诉求的积极回应，深刻体现了生态价值在从“美丽乡村”到“美丽中国”过程中空间的拓展性、时间的延续性和内涵的丰富性的辩证统一。

（一）实现了生态空间的拓展

乡村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阵地，从美丽乡村建设的典型模式出发到构建美丽中国，从空间上来看，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到全国的生态空间拓展，体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和从局部到整体的辩证统一。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基于典型示范向全国乡村的推广，从典型到普遍，从而实现中国乡村建设的整体生态变迁；美丽中国的提出，则是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在城乡一体化的实施过程中，实现城市和乡村的整体生态变迁。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对24个首批国家级生态村进行了公示，标志着我国对于农村生态建设管理和评价进入新的阶段。从典型生态农村建设模式的视角切入，梳理和研究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模式，从而重点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典型农村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各地因地制宜建设美丽乡村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以助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

（二）实现了生态时间的延续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十八大报告提出实现中国民族的永续发展，其实质是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对“美丽中国”的更深一层阐释，是现代化建设的从又快又好发展到又好又快发展到又好又美发展的科学发展的深刻体现。“美丽中国”的构建要求以自我再生的动态平衡引导发展，既关注当代人的利益，又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强调一个国家、地区在发展进程中的长期合理性。从而扬弃传统片面经济增长型发展模式，在社会发展运动中确立协调化理念、切实遵循协调规律、把握协调需求，努力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求人类改变传统的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思想观念，转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现象，对自然界进行价值评估，对自然的内在价值、伦理价值与生态价值进行科学审视，把人的发展同资源消耗、环境退化、生态胁迫等联系在一起，体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协同进化。另一方面要求人们转变长久以来的“道德顾客”身份，对自然界的自然价值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不仅对当代人而且对子孙后代所应当享有的自然价值的公平性富有责任和担当，因此，人们只有注重人类活动与自然规律相协调，真正认识和掌握生态运动的规律，把改造自然的行为严格限制在生态运动的规律内，才能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经济社会之间的矛盾，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三）创新了生态内涵的丰富性

从内涵来看，美丽乡村建设是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为推动点，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下，解决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蕴含了丰富的生态内涵，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在农村的具体表现；美丽中国则从自然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美学价值等几个方面进一步丰富了美丽乡村的生态内涵，美丽中国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和归宿。

美丽中国是一个系统概念，是包括绿色经济、健康生态、美好人文、幸福生活、和谐社会的总称，是科学发展在中国的生态实践，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一是对自然界进行价值评估。自然价值通过它本身的固有属性客观存在，属性是客观的、存在方式是普遍的，并且有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之分。因此，

人应当对自然界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人与自然的道德义务与人对人的道德义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自然负责即对人类自身负责。维持人的生存，就内在地包含了维护作为人的生存根基的生态系统的生存，而保护了生态系统，人的生存也有了保障。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说明“美丽中国”的构建是其自然价值的存在为基础的，并对人应当对自然所承担的道德义务指出具体实施路径，“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二是对经济价值进行生态评估。

“美丽中国”理念的提出是要“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必然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而经济的发展必须摒弃旧发展观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局限性，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发展绿色农业、创新生态工业等方式实现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对经济价值进行生态评估成为“美丽中国”构建过程中的应有之义。经济的发展是构建“美丽中国”的前提和基础，但发展的经济必然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实现经济发展的实施路径“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开展。三是对社会价值进行生态评估。“美丽中国”的构建要在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来调整和变革社会发展的所得到的结果，所以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人的活动的自觉能动性，这是一个在确证人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人的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使客体按照人的内在尺度和物的外在尺度发生改变，使自然界、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自身获得全面而和谐发展的过程。因此，必须在构建“美丽中国”的过程中审视生态问题，如果人与自然关系解决不好，不仅会造成人与自身关系的失衡，还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关系到和谐人格的建立，关系到和谐社会的确立。四是对美学价值进行生态评估。这是对“美丽中国”的生态和谐之美的整体解读，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到的“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的价值追求。“美丽中国”美在

环境、美在人文、美在社会，是建立在生态文明基础上的生态和谐整体之美，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在新的历史高度所做的新判断、新思考、新要求，也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发展，从而从“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布局出发，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来源：《理论月刊》 2013 年第 9 期 柳兰芳）